

教育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第42卷(2022年)

第36期(总第815期)

1981年创刊 1985年公开发行

编委会主任:郭晚盛

副主任:卢红

委员:刘斌魁 王爱玲 张俊珍

主编:郭晚盛

副主编:卢红 王爱玲 张俊珍

责任编辑:虞日敏 张丽娟

英文翻译:李学谦

本刊声明

1.本刊从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教育理论与实践》杂志。

2.本刊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采编系统,大家可以到“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官网“学术期刊”之下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采编系统~作者投稿系统”进行投稿。由于系统刚开始使用,目前我们同时接受邮寄到编辑部的纸质稿件。

3.本刊拥有对所刊发稿件的网络使用权,网络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付。如无特殊说明,即视作同意;如有异议,务请在来稿中说明。

4.本刊联系方式:0351-5604672。

目 录

高等教育

- 3.“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
——基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思考
..... 刘 磊等
- 8.基于学生视角的大学校园文化认同调查 任初明等
- 13.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薛 茜

职业教育

- 17.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条件、问题与优化路径
..... 王家熙

思想政治教育

- 21.新媒介环境下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复杂境遇及德育应对
..... 杨淑萍等
- 27.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多维逻辑 韩玉璞
- 31.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路径思考 解 萌
- 35.论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辩证关系 潘丽芬
- 39.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黄锁明等

师资建设

- 43.问题与策略: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 梁炳辉等
- 48.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
的困局及破解 王安琪等

教学研究

- 52.辩论式教学法的情境创设优势与设计原则
——以高校说理写作课程为例 高 策等
- 57.社会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在医患
沟通课程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葛文嘉等
- 61.“五育并举”视野下的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高 燕等

封二:新时代探索学科交叉导师团队制的研究生培养路径
——评《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研究》 马肖华

封三: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的选择与实施探讨
——评《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指导》 李敏芝

[期刊基本参数]

CN14-1027/G4 * 1981 * s * A4 * 64 * zh * P * ¥8.00 * 1400 * 14 * 2022-36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电话 0351-7086996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Vol.42, No.36, Dec. 25, 2022

Editor-in-Chief: GUO Wan-sheng Chief-editor: LU Hong WANG Ai-ling ZHANG Jun-zhen

Contents

Higher Education

-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by “Return to Noumenon”
——Reflections on *The Overall Pla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LIU Lei(et al.)
- A Survey of Campu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Students’ Perspective REN Chu-ming(et al.)
- Reflec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of Opera in Art Colleges XUE Qian

Vocational Education

- The Conditions,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o Help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NG Jia-xi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Socializa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YANG Shu-ping(et al.)
- The Multi-Dimensional Logic of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HAN Yu-pu
- Reflections on the Path of Xi Jin-ping’s Rule-of-Law Thought into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XIE Meng
-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Culture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PAN Li-fen
-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IPTTIAC Teaching in New Engineering HUANG Suo-ming(et al.)

Teachers’ Development

-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Supervisor Team in Universities
..... LIANG Bing-hui(et al.)
-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ANG An-qi(et al.)

Teaching Research

- The Advantage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Situational Creation of Debate Teaching Method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Universities GAO Ce(et al.)
-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the Cours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GE Wen-jia(et al.)
-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usic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ve Education simultaneously” GAO Yan(et al.)
- Exploring the Postgraduate Cultivation Path of Interdisciplinary Tutor Team System in the New Era
——Comment on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Postgraduates* MA Xiao-hua
- A Probe into the Sele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A Review of *Guidance to Music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Kindergarten* LI Min-zhi
-

Basis Parameter of the Journal

CN14-1027/G4 * 1981 * s * A4 * 64 * zh * P * ¥8.00 * 1400 * 14 * 2022-36

“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

——基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思考

■刘磊, 宫龙江

摘要:“回归本体”是高校学术评价的核心价值目标。其基本要义是回归学术活动的本质,回归到立德树人之上,以评价对象的发展为宗旨。当前,高校学术评价过分注重刚性指标,学术评价的实质性不足;无视学科差异、岗位特点,学术评价呈现“标准化”“一刀切”问题;学术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注重学术内涵发展的过程评价长期被忽视。“回归本体”高校学术评价的改革要建立健全量化评价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构建以学科、岗位特点为依据的分类评价体系;改进问责导向的结果评价,强化发展导向的过程评价。

关键词:高校;回归本体;学术评价;学术治理;学术内涵;综合评价模式;评价体系;过程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03-05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了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根据《总体方案》和“破五唯”的学术评价导向要求,当前我国高校学术评价正处于旧评价机制影响犹在,新评价体系尚未建立的破立交替阶段。“学术评价是指根据一定的目的和标准,采用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对学术成果、人员、机构、学术媒体展开的价值判断活动,以衡量学术活动及其相关事项的有无、多少、作用和价值”^[1]。高校学术评价具有复杂性和操作困难的特征,评价的权威性及其方式、方法的有效性容易引发质疑。一些高校选择使用学术活动的可量化特征,如发表论文和获得奖项的数量、论文发表期刊和奖励、项目

的级别等来替代对学术成果创新性特性的评价。这些可量化特征只是指引评价者接近学术本质的线索,而不是学术评价的应然对象^[2]。这种效率优先、数量至上的实践操作,容易误导高校研究者对学术活动产生功利心态,偏离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此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和高校开展的学术评价对价值目标缺乏充分考量,没有从评价对象的立场出发,评价结果不能反映评价对象本身的性质。这种缺乏科学性、有效性的评价行为会在评价者和评价对象之间形成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破坏学术研究的健康生态。就此而言,高校学术评价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策略研究对于推进高校细化科研评价改革办法,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专门针对高校学术评价的研究不多,一些观点散见于大学评价研究中。学者们普遍关注高校学术评价中的价值导向和方法策略。有研究指出,教育评价

* 本文系2020年度辽宁省教育厅厅长突破项目暨辽宁省高校校际合作重大科研项目“教师职业道德的发展性评价工具设计及其应用策略”(项目编号:辽教发[2020]28号)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磊(1979-),女,山东济南人,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政策研究;宫龙江(1980-),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

的“唯”导向机制形成了一条简单化的逻辑线索,助长了将教育作为工具抢夺社会资源的极端功利行为,使得科研环境浮躁,基础研究备受冷落^[3]。有学者指出,以往高校学术评价的问题在于无视高校与企业的差异,简单地运用企业目标责任制和绩效管理,从而引发“评价至上”和“问责崇拜”^[4]。也有学者提出,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应当充分考虑高校类型层次的差异性和不同岗位职责教师工作内容的多样化^[5]。还有学者提出,应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辩证看待定量与定性在评价中的作用,坚持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并重。

高校学术评价是对学术成果及其所有者进行价值判断^[6]。那些引发强烈不满的评价从根本上源于价值问题而非技术问题,所以应当把价值目标置于学术评价的中心。“回归本体”是高校学术评价的核心价值目标。“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有三个基本要义:其一,高校学术评价首先要回归学术活动的本质。学术活动的本质是求真,其灵魂是创新^[7]。高校学术评价最重要的是要看知识创新和学术贡献的程度。其二,《总体方案》把坚持立德树人置于“五个坚持”之首。因此,高校学术评价要坚持回归到立德树人之上,打通科研与育人之间的多种互通渠道。其三,高校学术评价要以评价对象的发展为旨归,其不仅要根据结果进行价值判断,还要通过在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价值发现,协商建构价值,达成价值互认,激励高校研究者创造新概念、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本文将聚焦高校学术评价的本体和原点,基于“回归本体”的目标导向和根治异化的问题导向,探寻高校学术评价如何有效贯彻《总体方案》的逻辑理路。

二、高校学术评价的异化逻辑与现实表征

与“回归本体”相背离的是高校学术评价的异化逻辑。当下,高校学术评价的异化逻辑还有其实践惯习,或隐或现地表达为不同形式。有效实施《总体方案》,为高校学术评价赋予教育性和学术性内涵,须将“回归本体”的目标导向和根治异化的问题导向相结合。长期以来,高校学术评价异化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过分注重刚性指标,学术评价的实质性不足

我国高校内部有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两大系统,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学术委员会等学术性机构往往独立性不够、学术权力迷失,甚至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庸”和“幌子”,这使得学术评价偏离本质、实质性不足^[8]。“权力主体之所以能够支配权力客体而客体又不得不

服从,原因在于其拥有某种客体所没有的资源。这些资源是权力赖以成立的基础。”^[9]高校行政掌握办学资源和资源的分配权,因此,高校学术评价往往由行政主导。20世纪90年代至今,“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促成了高校之间进入金字塔顶端的制度性竞争机制,形成了从国家层面到省级层面,再到高校内部学科层面自上而下的竞争链条^[10]。为提高学校和学科排名,政府和高校将企业管理中的绩效评价引入学术生产,导致行政更多地介入学术评价。抽象、简化复杂的科研评价工作,采用“更直观”的方式,运用简单的刚性指标和工具识别、测量与反馈学术生产,是行政部门进行学术评价的共同经验^[11]。

近些年,量化为主的评价方式备受青睐,逐渐由最初的激励高校教师开展学术研究、衡量学术研究水平的功能泛化到教师工作绩效评价、职级晋升、硕博毕业资格审查、强化教育行政权力等方面。一些高校表现出奖励和项目的级别崇拜,一些学校的学术评价重期刊发表、轻学术提升,陷入“以刊评文”的误区。“以刊评文”在高校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课题验收等活动中得到普遍应用。“以刊评文”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作为学术评价的根据,导致学术评价简单化、形式化、功利化,给学术期刊建设带来困扰,也偏离了高等学校学术评价的实质特征。一方面,其窄化了高校学术评价的范畴,忽视了科研产出对政策咨询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其误导研究者片面追逐期刊热点,过度关注影响因子,妨碍科学创新。

(二)无视学科差异、岗位特点,学术评价呈现“标准化”“一刀切”问题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我国高校已发展成为规模庞大、人员结构复杂、发展状况和目标多样化的组织体系。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不同岗位教师的目标、任务存在客观差异。由于不同学科具有不同的知识生产逻辑,所以不同岗位、不同类型高校教师的学术成果形式和实际贡献认定标准明显不同。然而,高校学术评价理念、指标、内容、方式对评价对象的特殊性却疏于回应,评价标准高度趋同,普遍聚焦于教师的科研产出,“唯”的导向明显。一方面,分别对应研究型、教学型、应用型等不同类型教师学术发展的分类评价体系有待建立健全。另一方面,针对高校教师多样化的学术发展互认融通评价机制尚未建成。有学者指出,简单将高校学术评价局限于科研评价,用同一把尺子衡

量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的教师,既有失学术公平,又妨碍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1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行政部门把政府和社会的外部评价盲目照搬到学校内部的学术评价,从方便管理的原则出发,制定采用“标准化”“一刀切”的考核政策和评价要求。

(三)学术评价结果使用功利化,注重学术内涵发展的过程评价长期被忽视

近年来,在高校科研评价中,基于论文、项目、奖项等学术符号的科研评价结果与评价对象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这些利益诉求既包括行政体系的政绩、声誉、办学资源,也包括高校教师的薪酬、资金、职称晋升、学术资源以及教师家属的升学、就业等。有学者指出,在这种功利化学术评价体系中,高校教师成为追逐与相关指标挂钩的物质报酬和各种‘帽子’背后蕴藏的经济收益的博弈者和“买卖人”^[11]。高校内部教师间、学科间陷入无序竞争,“重科研轻教学”问题愈益突出。“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推进高校改革发展聚焦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行政部门一方面,构建一套包括论文、项目、奖项、职称和“帽子”的荣誉系统,采取各种“激励”和“鞭策”措施,激发高水平学术产出。另一方面,采取特殊政策、建立特殊通道,以高薪和优厚待遇引进高层次人才。人才竞争和人才评价理念向全体教师的日常管理渗透,进一步强化了量化的科研评价结果与教师薪酬水平、职称晋级之间的关联度,导致教育评价结果使用的功利化。

三、“回归本体”高校学术评价的改革进路

“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既要有效评价学术成果的贡献和成就,还应当将科研评价重点从成果扩展到育人,引导大学提升立德树人成效。在改革实践中,“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亟需理顺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之间的冲突^[13],化解顶层设计与基层运行之间的冲突,切实推进三方面具体工作。

(一)建立健全量化评价和同行评议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式

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原创中突显卓越性,在思想建构中蕴含科学严谨性,为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关键锁匙,具有显著的学术贡献、育人贡献、社会贡献及政策贡献。高校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向是健全综合性评价模式,根据评价对象、目标和内容的属性特质,分别赋予量化评价、同行评议的不同权重^[14]。

量化评价具有可测性、可比性、可区分的特性,但

是单纯的量化评价会滤掉评价对象的许多难以分解和量化的重要信息,遮蔽对重要创新的准确评估,致使评价结果偏离评价对象的属性。有学者提出,量化绩效指标容易被人操控,单纯的科研量化评价还会诱发泛滥成果的大量生产和“对照指标搞建设”等问题^[4]。

同行评议是“内行人”为审核其他学者作品的质量而采取的一种以主观判断为主,力求保证结果合理性、可靠性和可信度的制度设计^[15]。高深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决定同一领域或相近研究领域的专家更能从学术角度真正领会与把握特定学术成果的价值与贡献。有学者认为,探索学术同行评议为主的代表作评价制度有助于扭转重数量、轻质量的科研评价倾向^[16],遏制学术浮躁之风,挤破粗制滥造的学术泡沫,鼓励潜心研究^[17]。不过,同行评议也存在一些倍受诟病的问题和缺点,如操作复杂、组织协调困难、成本较高、易受群体压力影响、偏爱学界主流选题、学术关系寻租、缺乏客观公平的保障机制等。

对此,西方国家已经探索出一些比较成型的科研评价经验,其共同特征是以专家评价的质性评估为主,由量化评估支撑专家评价。荷兰的“莱顿宣言”关注量化指标在克服同行评价主观偏见的功用,提出了合理利用期刊评价指标的原则^[4]。为更好地发挥量化指标信息在科研评价中的支持功能,德国科学理事会建立了“量化指标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专门指导同行专家有效使用量化信息。该体系对五类科研成果绩效指标的功能、问题和使用方式进行了明确界定。这五类绩效指标包括文献计量、申请项目额度和项目性质、培养博士生数量、科研奖项及大会发言、专利收益^[18]。高校科研评价的综合化改革须借鉴国际经验,着眼于我国高校科研发展的目标任务,提升对量化指标和同行评议功能、问题和限度的认识,探索多种模式,实现科研成果绩效量化指标和学术性判断的相互佐证和优势互补,全面如实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属性。

(二)构建以学科、岗位特点为依据的分类评价体系

《总体方案》中提出,根据不同学科、不同岗位特点,坚持分类评价。这不仅符合学科发展规律,还会更加有效地激发各岗位教师的学术发展内驱力,对于破除“唯论文、唯奖项”和“以刊评文”意义重大。

学术评价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某种角度上说,高校是以学科为基础组建起来的知识生产与创新的组织。知识生产创新具有明显的属性差异和内在

规律。不同学科的知识发展逻辑不同,在研究对象、研究标准、研究范式、学术产出形式上存在明晰界限。因此,并不存在适用于全部学科领域的学术评价工具^[11]。高校学术评价应当统筹兼顾基础学科、应用学科,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大的学科门类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承认不同学科专业在发表文化、论文作者署名策略等方面的差异,关注各领域的“平均值”,坚持共通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层次的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高职院校所承载的任务和使命也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影响着高校人才队伍的结构。教学为主型教师、科研为主型教师、应用推广为主型教师、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的岗位分类方式得到我国很多高校的认可。开展学术评价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学科和教师的岗位特点,分类进行。一方面,应在借鉴博耶、托尼·比彻、舒尔曼、赫钦斯等西方学者学术分类思想的基础上,加强高校定位和教师岗位相结合的学术分类中国化研究,为建立科学的高校学术分类评价标准提供理论框架^[19]。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完善以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和不同岗位特点为主的多元分类评价体系,在教师成果认定、聘任与晋升等方面根据知识生产创新的内在逻辑、岗位差异性,将同一或相类似学科、岗位置于同一的评估标准和学术框架中进行评价。

(三)改进功利化、问责导向的结果评价强化发展导向的过程评价

当前,我国许多高校采取目标责任制的问责导向科研评价。大学、院系、教师个人的目标和任务逐层细化、层层传导,这使得链条末端的教师成为大学整体学术绩效的“贡献因子”和“被问责”对象^[4]。这种基于科研产出结果的问责导向学术评价背后的理论假设是,外部利益引导和“问责”可以激发“被问责”对象的动力,引出高水平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

张应强等学者对问责导向的结果评价给高校学术生态带来的潜在危险进行了客观深刻的研判。其一,以问责为目的的结果评价会在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形成互不信任的提防关系,进而使高校学术评价陷入“零和博弈”。其二,“水涨船高”绩效标准下开展的结果导向科研评价会引发“学术内卷”的“攀比文化”。其三,奖励和科研“问责”评价的“硬挂钩”会矮化教师科研工作的性质,不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其四,当“问责”压力超过一定阈值范围时,会出现问责失灵,引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投机行为。结果导向的问责评价机制在增强教师科研竞争意识,提高科研产出方面的成效会产生边际递减,无法成为教师学术生产的持久动力^[10]。

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有自身的特定逻辑,决不同于物质生产和权力资本运作。大量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热爱科学的学术志趣、自立自强的研究态度、超越创新的学术追求、批判质疑的探究勇气是学术研究的源动力,支撑研究者度过漫长的学术产出沉寂期。“回归本体”的高校学术评价应当客观研判高校教师的多重需要,处理好物质利益和发展学术内在需求之间的平衡,尽量保护教师学术研究的好奇心、兴趣和本质性追求^[20]。

《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客观要求高校学术评价改变其作为管理教师工具的异化功能,积极推进发展性评价改革,为教师科研发展提供过程性诊断和支持引导。强化高校科研评价的发展导向,一是要以科研胜任为基础,客观规定教师的“保底”科研工作量标准,合理发挥评价的激励约束作用。二是要深入挖掘数据潜力,完善“全过程、动态”科研评价,通过纵向追踪、横向比较等方式帮助教师更好认识自身科研优势、劣势和潜力,助力教师自我改进和发展。三是要调控高校科研评价的溢出效应,避免科研评价承载过多与教师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分配性功能。四是整合各类人才计划、奖励、项目评价体系,适度减少行政评价杠杆。

参考文献:

- [1]叶继元.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讨[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1):97-110+160.
- [2]石中英.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J].教育研究,2020,(9):4-15.
- [3]崔保师,邓友超,万作芳,李建民,黄晓磊,秦琳,翁秋怡,曹培杰,杜云英.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J].教育研究,2020,(8):4-17.
- [4]张应强,赵锋.从我国大学评价的特殊性看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基本方向[J].江苏高教,2021,(2):1-8.
- [5]李立国.建立符合高校教师工作特点的学术评价体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9,(2):10-12.
- [6]朱剑.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从“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谈起[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5-15+159.
- [7]张保生.学术评价的性质和作用[J].学术研究,2006,(2):10-15+147.

- [8]张耀铭.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73-88+190-191.
- [9]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
- [10]张应强.我国高校教师评价理念的反思与改革[J].高等教育评论,2022,(2):2-16.
- [11]张曦琳.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机制变革:逻辑、困境与路径——基于学术共同体视角[J].大学教育科学,2021,(2):62-70.
- [12]陈时见,胡娜.新时代高等学校教师学术评价的改进[J].教育研究,2020,(2):133-142.
- [13]白明亮,孙中举.从管理者到教师——基于人视角下的高校教师考核评价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16):37-41.
- [14]程天君,张铭凯,秦玉友,眭依凡,周海涛,郑淑超.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思考与方向[J].中国电化教育,2021,(7):1-12+21.
- [15]蔡连玉,吴文婷.高校学术治理的双重绩效与同行评议[J].江苏高教,2019,(5):35-39.
- [16]杜学亮.代表作评价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2):74-79+207.
- [17]臧峰宇.学术评价不妨尝试“代表作”制度[N].光明日报,2012-03-21(2).
- [18]巫锐,陈洪捷.质量何为:德国学术评价机制转型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21,(1):83-88.
- [19]颜建勇,黄珊.大学教师教学学术能力与学科学术能力良性耦合发展机制研究[J].教育科学,2018,(6):68-73.
- [20]朱亚宁.教师学术创新的沉淀成本及其控制路径探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3):27-29.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暨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邮编 116029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by “Return to Noumenon” ——Reflections on *The Overall Pla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LIU Lei, GONG Long-jiang

(Tianjiabing Academy of Education and College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Return to noumenon” is the core value goal of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Its basic essence is to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moral education so as to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objects as the purpos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rigid indicators so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is insufficient, ignores the differences of disciplin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ob posts so that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produces the problem of “standardization” and “one size fits all”. The use of academic evaluation results is utilitarian and the process evaluation which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connotation has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To reform “return to noumenon” academic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combining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with peer review, build a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s and job posts, improve the accountability-oriented result evalu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process evalu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ies; return to noumenon; academic evaluation; academic governance; academic connot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evaluation system; process evaluation

基于学生视角的大学校园文化认同调查*

■任初明¹,徐延宇¹,付清香²

摘要:大学的校园文化只有为学生所理解与认同,才能发挥其教育及管理功能。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学生视角对大学校园文化为学生所认同的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整体认同处于中等水平,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了解还需要加深,大学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激励与引导作用发挥还不充分。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认同程度不受就读年级、学校类型影响,但会受性别、就读学科专业类别、居住和学习校区等因素影响。为此,高校需要采取加强学生的文化领导、加强学校文化素材的整理与研究、精心设计校院两级学校文化传承载体、发挥“关键少数人”的示范引领作用等措施来提升学生对大学文化的认同度。

关键词:大学;校园文化;学生;文化认同;文化符号;文化引领;故事符号;文化传承;文化素材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08-05

大学校园文化是一所大学在办学实践过程中积淀与创造的文化形态,其本质在于大学师生及管理者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共知、共享和共行是其基本特征。大学校园文化所具有的增强大学师生的组织凝聚力、调节与规范师生组织行为、提升师生组织认同与归属、熏陶教育学生等功能已成学界普遍共识。目前,我国稍有一定办学历史的大学管理者都声称自己的大学拥有其独特的校园文化,其注重发挥大学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但正如奥赖利·查尔斯等学者所言,“组织提出或倡导何种文化或价值观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员工是否真正认同”^[1]。由此可见,大学校园文化贵在能得到师生的真正认同及践行。大学文化于20世纪90年代末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20多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采用思辨方法围绕大学文化的内涵、大学文化育人、大学文化建设、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大学文化生态、大学文化与大学治理等主题,而鲜有关于大学文化认同的调查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问

卷调查法,从学生视角审视大学校园文化为学生所认同的状况,以期提升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与传承提供一些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调查工具编制

大学校园文化认同反映的是师生群体对该大学所形成的组织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具体可表现为师生群体对一所大学在长期办学过程中所积淀形成或倡导的办学理念、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象征性文化要素的内心趋同、情感接纳及主动践行等活动。本研究参照陈致中、张德编制的《组织文化认同度测量量表》^[2]并结合大学组织特点进行了适当修改,将大学文化认同分为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维度,从大学文化的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行为层面设计了《大学师生对学校文化认同调查问卷(学生卷)》。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所调查对象的性别、所在高校类型及层次、学习阶段、专业类别、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学一般课题“大学新老校区文化传承机制与策略研究”(课题编号:BI-A11801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1.任初明(1974-),男,江西上高人,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大学文化管理研究;2.徐延宇(1975-),男,湖南长沙人,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3.付清香(1976-),女,江西上高人,广西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献资源管理与知识服务研究。

就读大学是否建有新校区、住宿情况以及平时上课所在校区情况,共8题;第二部分为新老校区学生对所在大学文化的认同状况调查,共24道题,包括学生对大学文化中校训、校歌、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等学校文化的了解程度、认同程度以及主动践行情况。1-10题是从大学文化认知维度设题,11-16题是从大学文化的情感认同维度设题,17-24题是从大学文化的行为认同维度设题。

问卷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法,对“完全不同意”赋值1,“不太同意”赋值2,“不确定”赋值3,“比较同意”赋值为4,“完全同意”赋值为5。

(二)问卷预调查及项目分析

为检验所编制调查问卷的适切以及可靠程度,笔者对拥有两个及两个以上校区的200名在读学生进行了问卷预调查,分别回收有效问卷189份,问卷回收效率为94.5%。采用极端值比较、题项与总分相关、同质性检验三种方法分别对《大学师生对学校文化认同调查问卷(学生卷)》的24个题项进行了项目分析,24个题项都达到了指标数标准,未达标准指标数为0个,表明此调查表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区分度。

(三)调查及样本分布

正式调查以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问卷星”电子问卷发放形式,共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363份,有效回收率为90.86%。样本分布情况为:男生500人,占36.7%,女生863人,占63.3%;大一学生324人,占23.8%,大二学生390人,占28.6%,大三学生327人,占24.0%,大四学生173人,占12.7%,研究生149人,占10.9%;学生来自文科678人,占49.7%,理工科685人,占50.3%;来自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1094人,占80.3%，“双一流”建设高校269人,占19.7%;有新校区的学生1026人,占75.3%,没有建新校区337人,占24.7%;从住宿情况看,常住新校区556人,占40.8%,常住老校区638人,占46.8%,新老校区都居住过145人,占10.6%,长住校外24人,占1.8%;从上课地点看,一直在老校区上课600人,占44%,一直在新校区532人,占39%,新老校区都上过231人,占16.9%。

(四)统计分析工具及信度检验

问卷利用统计软件SPSS20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采用Cronbach Alpha系数检验方法,信度系数为0.909,

表明本次问卷调查的内部一致性达到较好状态。

二、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一)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从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认同度均值统计可知,对学校文化整体认同得分均值为3.6922,三个维度中,认知认同维度得分均值为3.6393,情感认同维度得分均值为3.7620,行为认同维度得分均值为3.7059,说明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从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等级程度的百分比统计(表1)可知,有3.8%的学生对学校文化不认同,23.5%认同度一般,两者合计27.3%,说明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度不高。从三个维度看,在校园文化的认知维度上,有32.2%的学生不太认同;在校园文化情感维度上,有28.3%的学生不太认同;在校园文化行为维度上,有31.6%的学生不太认同。

(二)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符号及内涵的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校训、校徽、校歌、校风、学风常常是一所大学校园文化的凝练与体现,办学理念与目标则集中反映着一所大学的价值追求,也是学生了解、接受和传承大学校园文化最常见的文化符号,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浸染与教育熏陶。让学生充分了解、领会这些文化符号是高校提升学生对学校文化认同与传承的基础。但本次调查显示,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符号的了解及内涵理解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超过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的校园文化;25.6%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的校风;25.9%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的学风;27.7%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的办学理念与目标;31%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倡导的价值观;37.2%的学生不了解自己大学的校史;28.8%的学生不能准确说出自己大学的校训;48.7%的学生不能准确诠释大学校训的内涵;52.9%的学生不知道自己大学校徽的含义;50.8%的学生不会唱校歌;56.6%的学生不熟悉学校的典型人物或事迹。

(三)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情感归属感还需精心涵养

组织文化的情感认同具有凝聚人心、提升成员组织归属感的作用。对大学文化的情感认同体现的是学生对自己大学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归属感,对

于培养学生于大学的忠诚与心理归属感具有重要作用。但本次调查显示,大学还需要精心涵养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情感归属感。有 21.9%的学生不认同自己大学倡导的价值观念;26.3%的学生不赞同自己大学的办学理念;31.8%的学生无法为自己学校的历史文化底蕴产生自豪感;35.1%的学生不喜欢自己大学的校徽设计;48.6%的学生不喜欢自己大学的校歌;36.7%的学生无法产生在校学习的自豪感。

(四)大学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激励与引导作用发挥还不充分

大学校园文化既是一种组织文化,也是一种教育资源,其既有一般组织文化所具有的调节与规范成员行为的管理作用,也具有作为教育资源的激励与引导学生的育人功能。本次调查显示,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行为认同度并不高,大学校园文化对学生的激励与引导作用的发挥还不充分。有 25.9%的学生表示不会主动践行学风,27.4%的学生表示不会主动践行校风,42.0%的学生表示学校典型人物无法激励自己,51.3%的学生表示不能用校训引领自己,67.4%的学生表示校歌不能激励自己。

(五)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认同不受就读年级、学校类型影响,但会受性别、就读学科专业类别、居住和学习校区等因素影响

对性别、就读学科专业、学校类型三个因素采取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就读年级、居住校区、学习校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 1)可知,从对大学文化认同的均值看,本科生与研究生、“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均值相差不大,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不受就读年级和学校类型等因素影响。但女生均值高于男生,文科专业学生高于理工科学生,常住学校新校区学生高于常住老校区以及新老校区都居住过的学生,一直在新校区学习的学生高于一直在老校区学习以及新老校区都学习过的学生,且这几类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性别、所读学科专业、居住校区和学习校区会影响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的认同。

三、提升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的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学生对大学校园文化整体认同处于中等水平,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还有待加强,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表 1 人口学变量对大学文化认同的影响分析

人口学变量	分类项目	均值	标准差	Sig	差异是否显著
性别	男	3.6476	.54742	.030	是
	女	3.7180	.59100		
就读年级	大一	3.6952	.56242	.769	否
	大二	3.6724	.55067		
	大三	3.7266	.55319		
	大四	3.6782	.60947		
	研究生	3.6779	.67681		
就读学科专业	文科	3.7308	.59372	.014	是
	理科	3.6540	.55610		
居住校区	常住学校新校区	3.7484	.57710	.017	是
	常住学校老校区	3.6562	.56305		
	新老校区都居住过	3.6624	.59400		
学习校区	一直在老校区学习	3.6433	.57734	.010	是
	一直在新校区学习	3.7472	.59750		
	新老校区都学习过	3.6925	.51034		
学校类别	“双一流”建设高校	3.7243	.49640	.256	否
	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3.6843	.59411		

注: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一)重视对学生的文化引领,提升学生的文化自觉

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大学倡导的一套核心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学生对大学自身文化的认同程度,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对大学提倡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接受与认可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高校对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及管理水平。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宗旨,大学形成的校园文化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具有独特的教育价值与管理功能。研究显示,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不太认同自己大学的文化,对此,学校管理者要重视与加强对学生的文化引领,要充分认识到以构建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价值引领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价值观的认同与潜移,作为学校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予以落实”^[3]。高校一方面可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学工、团委等学生事务组织机构的职能,面向学生精心设计以校训、校歌、校徽等文化符号系统以及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等价值观念系统为内容的专题教育活动,同时将这两大系统积极融入日常学生活动之中对学生进行文

化引领,让学生明白学校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内涵及所具有的特色;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校内教师的文化中介作用(前提是教师对学校文化也高度认同),让教师在日常的教学、科研、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服务等活动中,向学生阐释学校文化的内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播或践行学校文化,以提升学生对学校文化的文化自觉。

(二)善于借助故事符号来传承学校的文化

高校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高校在不同发展阶段涌现的优秀人物、事件是高校文化的宝贵素材与珍贵的文化之源。这些优秀人物事迹通常体现着高校的文化,并可为其他师生提供榜样,高校要善于将其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以及校友毕业后践行高校文化的典型案例,编撰成反映高校文化的各类人物故事或校园剧,通过故事这一文化符号来传播高校共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展现文化的最佳方式是透过组织成员口耳相传的故事”^[4],正如哈佛大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所说,“故事是领导者的艺术宝库中最强有力的一件武器”^[5]。故事能起到例示或简化组织价值体系的作用,有利于组织价值观保持长久活力,容易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为员工提供一种共享的理念。高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些人物故事,不断充实学校文化素材,编写高质量的校史及文化读本或教材,并纳入学校公选课程体系,向学生开展常态化的校史教育,通过学习教育来增进学生对大学自身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进而提升学生对校园文化的情感认同与心理归属感。

(三)精心设计校院两级学校文化传承载体

高校要发挥“关键少数人”的示范引领作用,增进学生的行为认同。各高校可考虑学生性别、就读学科专业类别、学生入住校区等因素对大学校园文化认同的影响,从校院两级精心设计大学文化传承活动载体与表现形式,可将集体诵校训唱校歌、入学典礼、毕业典礼、学位授予典礼、学校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或事件纪念日等,打造成校院两级的典型仪式活动和特色文化活动。通过这些象征性互动的文化活动,既可为师生营造出大学文化传承的仪式感与自豪感,又可向师生传递学校共享的价值观念,有效增进师生的组织认同与价值传递。

“组织领导人是组织的精神领袖,他们既应该是组

织文化建设的设计者、组织者、引领者,又应该是组织文化最忠实的实践者。”^[6]高校领导层不仅影响着学校文化的塑造,也同样对学校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影响。在组织文化建设过程中,“组织中的领导者通常被视为重要的‘信号发生器’,他们的言谈举止有意或无意地传递信息,从而说明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7]。在组织变化传承过程中,组织领导人是最重要的组织文化载体之一,其模范带头和组织引导作用是组织文化有效传承的重要保障,其导向和推动作用是创建和传承组织文化的关键。因此,在新老校区为传承学校文化而设计的各种活动中,要积极利用好文化认同过程中的“伟人效应”^[8],发挥学校及学院领导作为“关键少数人”的在学校文化传承中的示范引领作用,主动学习、展示和阐释学校文化及其内涵,在广大师生面前率先垂范,在日常工作场所或各种象征性活动中主动佩戴校徽,出席各种仪式活动带头诵校训、唱校歌来展示对学校文化的认同,通过发挥“关键少数人”的示范带头作用,将学校文化在日常工作中外化为学校管理层的普遍性的行为举止、气质和观念,从而促进学生对学校文化的行为认同。

(四)加强学校文化素材的整理研究与补充更新,增强学生情感认同

“文化符号,人物及事件,礼仪、习俗、传统,信念和价值是文化的四重表现形式”^[9],除了要加强校训、校徽等文化符号系统建设外,各高校要重视与加强学校文化传统历史的整理、研究与挖掘工作。可由院校研究机构或高等教育研究所负责对校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全面厘清学校文化的形成历史与变化脉络,系统阐释大学自身办学理念的内涵与精神实质,搜集整理学校不同发展阶段涌现出的优秀师生事迹,使之成为展示学校文化最生动、最具感染力与教化力的载体。此外,高校还要积极建立与完善学校优秀文化素材的充实机制,可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定期搜集整理学校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以及校友毕业后践行学校文化的典型案例,以期为学校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丰富的素材。

参考文献:

- [1] O'Reilly Charles, Chatman Jennifer, Caldwell David. 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 Profile Comparison Approach to Assessing Person-Organization Fi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 Journal, 1991, 34(3): 487-516.
- [2]陈致中,张 德.中国背景下的组织文化认同度模型建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30(12):64-69.
- [3]吴中平,徐建华,徐跃飞.冲突与融合:学校文化建设新视角[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22-123.
- [4]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M].陈淑珠,郭欣春,曾慧琦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121.
- [5]安妮特·威池.管理沟通策略:案例教材[M].毕香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
- [6]王若军,雷高岭.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145.13.
- [7]胡可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59+313.
- [8]郑晓云.文化认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1.
- [9]李延保.关于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思考——兼谈现代大学文化建设[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89-201+208.

作者单位:任初明,徐延宇 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邮编 530001;付清香 广西大学图书馆,广西 南宁 邮编 530001

A Survey of Campu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Students' Perspective

REN Chu-ming¹, XU Yan-yu¹, FU Qing-xiang²

(1.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2. Library of Guangx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ampus culture of a university can only play its educational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if it is understood and identified by studen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of college campus culture identified by students from students' perspective through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overall identification of campus culture is at a medium level,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campus culture needs to be deepened, and the role of campus culture in encouraging and guiding students is not fully played. The degree of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of campus culture is not affected by their grades and types of schools, but will be affected by gender, categories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 living and learning campuses. To this end, universities need to take such measures as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ultural leadership, strengthening the collation and research of school cultural materials, elaborately designing the carrier of school culture inheritance at department and university levels, and giving play to the exemplary and leading role of "key minority" to enhance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of university culture.

Key words: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students; culture symbol;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leadership; story symbol;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materials

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薛 茜

摘要:戏曲类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是艺术院校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部分。为了应对传统戏曲艺术面临的挑战,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院校戏曲类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应加强价值引领,把思政教育融入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严把招生关,培养有真才实学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重视地方戏剧种人才培养,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

关键词:艺术院校;戏曲;硕士研究生培养;价值引领;思政教育;民族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13-04

改革开放以来,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促进我国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培养戏曲艺术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文化娱乐电子化、表演艺术大众化、欣赏方式多样化的大潮,对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传统戏曲艺术面临的挑战,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艺术院校戏曲类研究生教育中探索增强传统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新模式,提高戏曲艺术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水平,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应实时关注行业发展现状,完善培养策略。

一、加强价值引领,把思政教育融入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

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高层次戏曲人才。戏曲人才的思想觉悟关系到未来我国戏曲发展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此,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指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优化思政教育课程,坚持把思政教育放在首位,在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中树立立德树人的思政建设教育目标。

目前,我国已有27所高校招收戏剧与影视学硕士研究生。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落实,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院校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涉及更多的专业研究方向。但无论是从事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教师,还是正在学习的戏曲类硕士研究生,受社会上各种思潮与商业化实用主义的影响,普遍存在重戏曲艺术专业教育、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这是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教材与课程安排有密切的关系。目前,我国艺术院校的思想教育主要是采用统编教材、通识教育的模式,这种教材与思政教育模式千篇一律,不考虑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在效果上容易造成学生轻政治课、重专业课,对思政教育敷衍应付的倾向,难以达到提高学生思政觉悟的目的。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要加强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思政教育,突破单纯依靠政治课管思政教育的狭隘观念,把思政教育当成一项系统工程,充分考虑戏曲艺术教育的特点,把思政教育与戏曲艺术教育结合起来,将思政教育贯穿到戏曲艺术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重视戏曲专业教育的优势,让每一位戏曲类硕士研究生课程的授课教师自觉地把立德树人、为国育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育才、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育才的目标融入到硕士研究生的课程中去,让戏曲研究生不仅通过政治课集中接受思政教育,而且在戏曲艺术课程的专业学习中,也能通过潜移默化,提高思想觉悟,提升道德素养,树立爱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戏曲艺术教育的全过程,除了抓好研究生必修的思想政治课教育之外,更多的工作在于改进研究生专业课的教育。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课时是专业课学习,因此,提升专业课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是关键。学校要加强专业课教师的思想政治学习,使教师明确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的意义,树立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的意识。

第二,在教师工作考核、职称评审时,艺术院校应把教师能否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教育列为年度考核、职称评审的重要内容,从源头上克服戏曲艺术院校重专业、轻政治的传统倾向。这样,教师在备课阶段,就会主动关心时事政治、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注意用主流思想统领专业课程设计。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自觉运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主旋律的素材指导学生的学习,抵制错误思潮与观念的侵蚀。

第三,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上,艺术院校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戏曲研究生思想活跃、文艺特长突出、喜爱表演,思想政治教育要针对戏曲研究生的特点,采用各种适合研究生发挥优势的形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艺术性和实践性,调动研究生的积极性,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例如,鼓励戏曲研究生以自编自演的包括地方戏在内的各种戏曲艺术形式,表现党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事件,结合专业学习,生动活泼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既可加强戏曲研究生的艺术实践,发挥戏曲研究生的特长,又可将立德树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地融合在专业课教育中,效果远胜于以课本和课堂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

目前,在艺术院校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做法还处在探索阶段,专业课教师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课的任务的观念还很普遍,大多数学校也缺乏相应的制度与规范。对此,戏曲艺术类院校需要在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注重创新,提高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硕士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意识,从思想观念、师资培养、课程设计、制度建设等方面同时入手,制定切

实可行的措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及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研究生教育全过程的目标。

二、严把招生关,培养有真才实学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

艺术院校戏曲艺术类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以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然而,随着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生越来越多,大学生就业率连年下降,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考生在报考高校时,对就业与收入的考虑成为重要因素。大学生对就业与收入的选择催生了“一流学生考理工、二流学生考文科、三流学生考艺术”的社会现象。大学毕业之后,许多无法找到理想工作与较高报酬的本科生,把报考研究生作为提高身价、谋求较好待遇的出路。在功利主义想法的驱动下,考研人数持续增加(202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接近100万,2022年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457万人,比2021年猛增80万人)。然而,戏曲艺术持续不景气的现实,限制了考研大军中的佼佼者优先选择戏曲类硕士研究生。而那些自感理工科难、文科也难、竞争力不够强的考生,则大批报考艺术类、戏曲类专业硕士研究生,希望通过报考“难度较小”的戏曲艺术院校获得硕士文凭。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

第一,艺术类院校必须严格执行硕士研究生招生标准,不能为了完成招生名额而放松标准,更不能把接收低层次考生看成是获取研究生生源的捷径。相反,戏曲类院校招收硕士研究生时,除了符合国家规定的硕士研究生考试科目的考核标准外,还必须突出专业特点。这考察考生是否热爱戏曲艺术事业、是否具有对戏曲艺术的追求与常识。很难想象,一个从未接触过戏曲、对戏曲一窍不通、只为一张硕士文凭的人,会献身戏曲事业,把振兴戏曲艺术作为自己的人生发展志向。要把考察考生对戏曲的态度、知识与经验作为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招考的必要环节。对于不热爱戏曲、对戏曲不感兴趣的考生,无论政治、外语、文化课分数多高,决不录取。

第二,录取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时,要把文化课中的文史知识作为考察的重要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只看总分。戏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戏曲艺术光彩夺目、博大精深,中文、历史基础薄弱的人,很难理解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营养、对悠久的中华文明产生共鸣,更谈不上通过戏曲的形式将优秀的民族文化发

扬光大。

艺术院校在招收硕士研究生时,坚持宁缺毋滥、质量第一的标准,可能会导致报考人数减少、录取人数不足、完不成招生计划的现象,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是为了提高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生源质量所必须负出的代价。长远来看,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的招生原则,将会改变整个社会对戏曲类研究生的看法,提高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价值,提高戏曲艺术院校乃至戏曲艺术的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真正热爱戏曲艺术的学生报考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打破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素质下降造成的恶性循环。严把招生入口关是从培养人才的入口开始,是应对戏曲艺术事业不景气的战略之举。

第三,为基层定向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扩大优质研究生生源。培养有真才实学的高端戏曲艺术人才,必须面向社会、开门招生,最大限度地拓宽优质生源。目前,报考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考生,主要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有工作经验的考生较少。另一方面,社会上并不缺乏已经从事戏曲艺术事业多年,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戏曲表演、编剧、导演、音乐、灯光、舞美等经验的基层戏曲人才。其熟悉生活,了解群众的需要,扎根基层,热爱戏曲事业,愿意以振兴戏曲为己任,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能报考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无法进入艺术院校进行深造。对此,艺术院校应解放思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开展为基层定向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试验,探索培养戏曲人才的新路子。

来自基层的戏曲类考生最大的缺陷是离校时间长,外语、文化课考试难以过关。针对这种情况,戏曲院校可开设戏曲类硕士研究生预备班,从基层正在从事戏曲艺术工作的青年中,招收文化基础好、有实践经验、适合深造的人才,进入研究生预备班学习一至二年,录取其中的优秀者按照同等学历者作为定向培养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研究生的招收立足于为基层服务、振兴戏曲事业。

从基层在职戏曲艺术从业人员中招收戏曲类硕士研究生定向培养,是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与我国戏曲艺术发展的实际出发,培养高端戏曲人才的创新之举,虽然周期长、工作量大,但培养出的人才专业思想牢固、专业意识强、接地气、会演戏,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体现了两条腿走路培养高端戏曲艺术人才的原则。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

是脚踏实地继承和振兴戏曲艺术的重要力量,是用民族传统文化占领文艺阵地的生力军。

三、重视地方戏剧种人才培养,繁荣民族文化

戏曲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国粹,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十分丰富。目前,观众群体最多的是五大剧种,即京剧、评剧、豫剧、越剧、黄梅戏。此外还有以粤剧、淮剧、川剧、秦腔、晋剧、汉剧、桂剧、潮剧、越调、湘剧、河北梆子、河南坠子等为代表的一批地方戏剧种。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剧种共同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然而,曾经光彩夺目的众多戏曲剧种正在消亡。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国共有戏曲剧种368个,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地方戏。到1982年,全国戏曲剧种已减少到317个。2006年,全国戏曲剧种仅剩267种,27%的剧种已经不复存在,仍然存在的剧种中有一半仅靠业余演出勉强维持。另据2017年的地方戏曲剧种普查,现存的剧种有348个,其中107个剧种仅有民营团体或民间班社。无论哪种统计,戏曲剧种的大幅萎缩与戏曲行业整体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对此,艺术院校戏曲类硕士研究生教育,在继续保持京剧作为中国戏曲代表的同时,应从为中国戏曲的整体继承与发展、全面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大局出发,重视培养地方戏剧种人才。

第一,从课程设置上要突出地方剧种的特色,根据地方剧种开设特色课程。除学习公共课,包含政治理论课、外语、戏曲通史、戏曲通论、中国美学课等外,要重点学习专业必修课,包含专业基础理论课、研究方向课、实践展演、学术活动等课程。此外,还需开设选修课,开阔学生视野,拓宽学识;开设补修课,以弥补短板,提升学习能力。其中,专业必修课要与该地方剧种紧密相关,应学习该地方的历史文化,深入研究该地方的风土人情。学生只有具备历史知识和理论基础后,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地方剧种,使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从而更好地开展地方剧种的展演。

第二,优化师资队伍,保障地方戏教学。地方戏剧种众多,根据实际情况,无法按照地方戏剧种配备教师,要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方法来完善地方戏教学的师资队伍。其一,要确定每年招生的地方戏剧种,根据招生的实际情况来规划教师队伍。其二,采用外聘的形式,补充教师队伍。据统计,全国现有10000多个剧团,可以根据教学需求与剧团签订合同,让优秀的

地方戏演员担任教师。其具有丰富的演出实践,业务水平较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三,实现校际间的地方戏剧种师资交流与共享。全国具有地方戏剧种的各类院校应结成地方戏教学联盟,打破院校界限,让具备地方戏教学知识的教师进行流动教学,相互弥补地方戏剧种人才短缺的现状。还可以利用线上教学,各院校共同组织地方戏剧种的公开课,实现资源共享。

第三,为学习地方戏剧种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由于地方戏受众的局限性,学生的展演机会较少,实践能力较弱,艺术院校应牵头与各地方剧团签订培养计划,输送学生到各地剧团参加演出。在实际演出中检验其学习成果,从而培养出适应社会的地方戏剧种人才。各地剧团也可从戏曲类院校输送的学生中签约优秀的地方戏剧种人才,这也为学习地方戏剧种的学生提供了就业机会。

此外,从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说,能够以最为通俗的方式、原汁原味地体现民族特色与中国戏曲多样性的艺术就是地方戏剧种。如果说,在国际文化

交流中,“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中国的”。要讲好中国的故事,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了解伟大的东方文明,就必须抢救地方戏剧种,振兴地方戏,让地方戏剧种薪火代代相传,让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在这方面,戏曲研究生教育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为国家培养高端戏曲艺术人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艺术院校培养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重要任务。艺术院校应综合运用多元培养策略,促进戏曲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升研究生教育理念,培养高质量人才,与国家发展的需求接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丁雅诵,龚仕建.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举行[N].人民日报,2021-12-28(11).
[2]吴乾浩.关于戏曲剧种认定标准的浅见[J].戏曲研究,2014,(3):11-20.

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科研处,北京 邮编 100073

Reflection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of Opera in Art Colleges XUE Qian

(Office of Academic Research,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re Arts)

Abstract: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drama is mainly aimed at cultivating high-end drama art talents with the purpose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art colleges.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raditional opera art and promo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value guidance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drama postgraduate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drama postgraduate education, strictly control the enrollment of students to cultivate high-end opera artists with genuine talents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of local-drama types to keep the rich and colorful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art colleges; opera; postgraduate training; value guidan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条件、问题与优化路径*

■王家熙

摘要:新时代职业教育要有效助力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具备资金、制度、人才等必要条件,如畅通的职业教育投资渠道、完善的区域合作机制、强有力的区域“双师”队伍。然而,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仍然存在适配度不高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专业学科与产业岗位衔接不及时、不顺畅,职业院校与市场主体对接不紧密、不充分,资源整合与分配共享结合不深入、不到位等。以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加快助推区域产业升级必须要优化学科设置,打造专业化职业学科体系;强化嵌入合作,基于区域产业链谋划职业教育发展;深化要素供给,推动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职业教育;区域产业发展;投资渠道;合作机制;“双师”队伍;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17-04

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源自三个层面的考量:第一个层面是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新时代职业教育要肩负起服务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双重责任。新施行的《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强调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进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产业体系、经济结构、职业分工、社会分配、区域产业发展等方面所要进行的巨大变革,加快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产教深度融合、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第二个层面是市场环境发展的需要。伴随着国内各项利好政策的落地,各类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不同领域以及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更加科学合理,职业教育作为人才供给的重要力量,需要聚焦新发展理念下的国家经济态势、着眼于“双循环”经济格局的构建,不断增强职业教育对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作用,提高人力资本的质与量。第三个层面是产教

融合发展的需要。多年来,产教融合政策的推行已经成果斐然,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市场行业的深度融合。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享受市场红利,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经济风险。全面提升职业教育的专业性、适应性,使其为稳定市场供应链、产业链作出应有的贡献。因此,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将其放在区域产业发展的环境中进行审慎思考。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之间能够实现互补共赢,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助推剂”。

(一)资金支持:畅通的职业教育投资渠道

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政府要充分发挥职能,全力支持职业教育改革工作,加大现代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力度。国家正逐渐调节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加大职业教育人力与物力的投入,保证基层政府财权

* 本文系自贡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重点课题“浅谈‘十四五’经济转型背景下职教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前景分析”(课题编号:ZYJY21-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家熙(1987-),男,湖北武汉人,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讲师,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与事权的对等,保证生均经费由当地地方财政拨款,加大建设职业院校的力度。同时,要由“重投入”变为“重效益”,保证经费用到实处,确保经费使用的合理性、规范性。职业教育仅依靠政府的投资并不能完全保证正常运行,还需要借助社会其他阶层的帮助。政府应出面为职业教育吸收社会力量,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多种途径筹集资金。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出台多个鼓励社会力量投资职业教育的政策制度,进一步增加投资渠道,进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因此,要让企业承担起一部分职业教育的经费,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职业教育,这也是未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制度支撑:完善的职业教育区域合作机制

职业教育区域一体化发展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企业公司有着紧密的联系。想要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制度和政策的约束和保障、协调与鼓励,进而扩展主体有限理性、强化主体行为的可信度。第一,在区域一体化大背景下,应当从职业教育多主体的合作、汇总整体职业教育资源,促进区域职业教育与企业共同发展、单行政区划教育管理体制的协同改革着手,做到运用整体化的思维统筹一体化发展设计。第二,必须加深对当代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体系结构、规章制度、统筹规范等的认知,推行校企合作机制,鼓励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管理工作。第三,职业院校要在政府的正确指引下,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结合的办学管理机制以及校企结合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制度。

(三)人才供给:强有力的区域“双师型”教师队伍

要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以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助力区域发展,必须注重“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与引进。“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效率直接关系到职业教育发展的最终成效,也关乎职业教育为区域产业发展服务是否能够实现。当前,必须结合产业的发展走向和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建立教师定期培训制度,增加教师到企业实践的时间,支持教师依据自己的专业选择合适的企业提升实践能力,积极参与到企业内部的开发和技术革新中,推动教师进一步接触到企业的组织形式、工作步骤、任务分配、用人条件、企业文化等,增加教师知识、技术、工艺等方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分配专业技术出众的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兼职教师,与在校的教师创建新的教学团体,互相鼓励、互相提升。创建大师工作室,充分发挥企业专业人员的优

势,提高教学效率。

二、当前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适配度不高的表现

从当前的教育实践来看,新时代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发展的适配度还不高,在专业结构、合作机制、联动效能等多方面不存在诸多问题。

(一)专业学科与产业岗位衔接不及时、不顺畅

职业教育主要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服务,是以人才需求为导向,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专业性强、综合素质高的优秀人才。然而,当前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与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不匹配,出现了职业教育人才输送与产业人才需求供需不平衡的现象。现阶段,部分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缺少针对性和时效性,未能实现同区域人才市场需求间的完美对接,忽视了区域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与区域的产业布局衔接不畅,未能真正设置符合现代化人才市场需要和企业岗位人才需求的新时代课程体系,无法紧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调。此外,部分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职业学校在设置专业课程时,忽视了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地域文化背景;未能准确把握区域产业的特征,盲目地为“高新尖”产业服务,设置热门专业,致使职业院校的专业同质化问题严重。

(二)职业院校与市场主体对接不紧密、不充分

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政策引导下,很多职业院校都构建起了产业与教育、院校与企业间的长久合作机制。除此之外,还形成了各种中介组织,开创了职业教育与产业进行产教融合的新途径。然而,从整体上看,区域产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动性不强,缺少完善的产教融合机制。特别是在职业院校的课程结构设计、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实践和教育实训方面,职业院校和企业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未能实现与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并且在开展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的过程中,企业缺少内在驱动力,没能实现区域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技能水平得不到提高。与科研型院校相比,市场主体对职业院校的偏好程度仍然偏低,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的企业数量尤其是龙头企业、高精尖企业主体比例不高。校企双方在管理方式、价值理念和根本属性上的不同,导致部分校企合作停留于表面,部分职业院校

并未将校企合作政策严格执行,导致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未能实现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共同进步,企业也出于风险考虑,忽视了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导致职业教育专业和产业间的匹配性较差,职业教育对区域产业发展的推动力不强^[1]。

(三)资源整合与分配共享结合不深入、不到位

职业教育作为技术人才的输送方,是产业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也是产业供给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实践中,职业院校也同样拥有调配和搜集各类职业资源的能力和权责,并依靠这些资源对受教育主体进行专业技能教育教学。同样,市场主体作为产业发展的具体执行者和推动者,对各类资源的需求更为迫切。然而,二者之间还存在利益分割不平衡、资源整合不科学、资源分配不合理、信息共享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部分地区未能通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有机结合实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上的创新,也未能真正建立起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间的直接联系。当前,职业院校的运转资金、生源招纳和教学资源主要依靠政府来提供,与“平等、开发、多元、竞争”的市场经济理念不适应,缺少双向性的资源互补。职业教育在助力区域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做到二者间的优势互补、没能体现二者间的立体化联动,导致区域产业发展的持续性削弱。

三、以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加快助推区域产业升级的现实路径

职业教育是培养大国工匠的前瞻性、先导性、基础性系统工程,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特别是产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发挥职业教育在推动区域产业发展上的重要价值,加强与区域产业经济之间的联动,提高人才培养的有效性,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与效果。

(一)优化学科设置,打造专业完备的职业学科体系

职业院校要科学构建学科体系,必须遵循四个方面的需求:一是围绕市场经济的需求。目前,职业教育是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起着积极作用,具有较高的价值底蕴。职业院校要设置符合市场专业结构和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学科框架,以区域产业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创新为导向提供人才服务,同时,合理分析区域产业发展的自然地理优势、人文地理优势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要,明确专业建设的方向,优化自身专业结构,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的人才。二是要迎合区域产业发展的需要。要实时关注区域产业发展走向,准确掌握区域产业的发展前景,特别是经济命脉型企业的发展方向。要展开充分的调查与研究,在把握地区经济发展动态的前提下,引导职业院校设置合理的学科架构。同时,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及时淘汰滞后于区域产业发展的专业,设置服务于区域产业发展的新学科。三是要适应区域产业集群发展需求。为了有效提高职业教育的资源利用率,适应区域产业布局的要求,职业院校必须重视专业集群建设,主动寻求产业规划部门和组织部门的帮助,实现职业教育学科架构与市场结构的科学、有效对接。职业院校要把握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开设相应的专业,重视特色专业建设,使专业布局适应区域产业布局,实现二者间的协调统一。四是要适应人才职业成长规划需要。职业院校要以区域产业人才需要为导向,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和学科框架,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服务;要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优化人才供给;发挥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推动科技进步,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智慧锦囊^[2]。

(二)强化嵌入合作,基于区域产业链谋划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应加强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吸引企业参与其培养人才的过程。企业和高职院校应共同拟订人才培养计划。一方面,要根据产业链条上的人才短板“缺什么补什么”。职业院校要与企业合作设立冠名班、定向培养班等,实施“订单式”培养,同时为满足学校招生和学生实习、就业的需求,开发产教结合的试点。支持高职院校引进企业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员担任技能教学工作和实践工作。在凸显技术性和实践性的专业领域,创建校企联合教学、合作育人的现代学徒制度^[3]。另一方面,要根据产业链条上的技术短板“缺什么学什么”。高职院校要积极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双管齐下的政策,加强校企合作。要组织教师到企业从事与其专业对口的工作,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水准。进而在课堂上能够完善课程教学内容,并采取合理的教学模式。

(三)深化要素供给,推动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当前,我国地域产业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仍然存在。而且不同地区由于资源禀赋不同、产业基础不同,所具备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各有差异,更为重要的是职业教育同产业发展水平呈现正相关。因此,必须坚持在全国经济一盘棋的原则下,加

快推进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化、专业化发展。一是要把市场主体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完善办学制度,实现高职教育办学主体的多样性,鼓励具备经济条件的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实施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创建分院、实习基地等方式,进一步研究校企合作办学制度^[4]。高职院校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办学模式,使学校的培养目标服务于社会需求,实现产教结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把打造多层次职业教育模式作为教育质效提升的重点方向。要改进传统区域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式,创建由国家直接主持、地方职业教育有关部门参与的职业教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协调组织,实施多层次的管理模式。除此之外,要注重参与主体的层次性,各大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功能也会随着政策和任务的变换而发生变化。不同的地区要依据自身所处区域环境,结合区域产业发展架构需求,量身定做符合自身需求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例如,河南职业教育的平桥模式、福建版的“二元制”职业教育、四川藏区的“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等。三是要把地区产业发展的相关各方作为产教合作的重要参与方。应按照职业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究职业

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从管理、运营、监督等多个角度将职业教育规划到地方经济的发展中。要从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角度出发,依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适当调整。政府主持分配教育资源的工作,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要以推动当地产业发展为目标。各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要充当职业教育体系的主体,充分落实相关制度与政策,将监督监察工作贯彻落实到底,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量。

参考文献:

- [1]罗汝珍.“智造”需求导向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机制创新[J].现代教育管理,2019,(3):86-90.
- [2]王淑涨.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供给侧改革[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21):33-35.
- [3]周建松.以“双高计划”引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现代教育管理,2019,(9):91-95.
- [4]谢元海,闫广芬.乡村职业教育的应然价值取向:生计、生活与生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J].教育发展研究,2019,(1):10-16.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四川 自贡 邮编 643000

The Conditions,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o Help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NG Jia-xi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cience,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needs such conditions as funds, systems, and talents. The key is to have smooth investment channel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fect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a strong regional “dual-qualified teacher” team. However,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there is still a problem of low adaptability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which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such three aspects as the untimely and smooth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and industrial posts, the untimely and insufficient connection betwee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market entities, and the incomplete inte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o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we must optimize the discipline setting to create a professional and complete vocational discipline system, strengthen the embedded cooperation to develop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regional industrial chain, and deepen the supply of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es with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era; vocational education; reg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vestment channels; cooperation mechanism; “dual-qualified teacher” tea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复杂境遇及德育应对*

■杨淑萍,朱星辰

摘要: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是个体成人的本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新媒体环境构成了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时代背景。新媒体环境的低门槛和海量信息易使大学生的道德意识淡化,网络信息的碎片化不利于大学生道德理性的发展,新媒体环境的虚拟性或致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弱化。高校应借助新媒体优势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全过程,强化大学生的道德意识;注重大学生新媒体素养的道德向度,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理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网络舆论方向,使大学生在增强文化自信和道德理性中升华其道德责任感,自觉抵御新媒体环境的不良影响,实现道德人格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环境;大学生;道德社会化;道德意识;道德向度;道德理性;道德责任感;道德人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21-06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4月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高等教育的综合发展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1]。而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水平的终极指标是所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其中道德品质是最核心的素质。大学生的道德品质是其道德社会化的结果,是个体在学校以文化人、以德育人的实践中,在与所生存世界的互动中,激活其作为道德生活主体的内在自觉,启动其主体反思机制,通过对自我德性的不断追问而推动其道德人格的逐渐生成与发展的过程^[2]。社会环境的自在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既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又潜隐着大量的不道德因素,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加剧了社会环境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大学生道德社会化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境遇。本文拟剖析新媒体环境的复杂特性,创生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德育模式,使新媒体技术成为助力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高效手段。

一、新媒体环境: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新境遇

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媒体应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概念,其内涵也会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3]。本文所提及的新媒体主要指相对于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统媒介而言,以最新的科学技术为手段的信息传播媒介及各种应用形式,如互联网、手机终端等。新媒体环境即是指融合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等多项技术的新媒体迅猛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大众传播环境^[4],具有以下突出特征:

(一)媒介主体的交互性与内容的海量性

交互性是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双向性和多向性。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只是从一点到另一点的单向传播,不利于信息的交流与沟通。而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扩大了人们接受和理解更多信息的机会和范围,为广泛的交换信息、互动交流和多方面咨询创造了便利条件,架起了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沟通的桥梁,突破了以往人际互动的“在场”限定,实现了身体退隐式的“缺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青少年道德社会化所面临的复杂境遇及其教育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9YJA88007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杨淑萍(1970-),女,山西夏县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道德教育研究;朱星辰(1993-),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道德教育研究。

场”联系,使人际互动和沟通几乎不受时空制约。新媒介凭借其强大的技术手段,摆脱了传统媒介受有限版面和固定播出时间的制约,可以承载海量信息。各种新媒介平台所接纳信息的容量之大、数据类型之多、处理速度之快是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的。通过各种新媒介平台的支持与合作,各种传播宣传手段的开发与整合,不同阶层受众和传播者的参与,对客观现实事件的多视角描述,催生了巨大的信息量。可以说,新媒介技术为全民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使普通民众、专业人士和精英人才都可通过新媒介平台展示生活常识、知识技能、各种发现与才艺等,不仅改善了知识与生活割裂的状况,为生活常识、知识技能的生活化普及提供了可能,也有助于不同群体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以及社会和谐。但不可忽视的是,海量信息所承载的价值观往往是多元异质的,易于造成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的价值选择困难。

(二)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内容的碎片化

新媒介作为人类信息传播的工具和平台,旨在为人们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服务,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人类有史以来的信息交流与传播,从烽火报警、信使传递家书、联机检索到互联网络,变化的不仅仅是信息内容,更重要的是信息处理与传播的方式^[5]。新媒介以其庞大的传播网络、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娴熟的传播技巧,将全世界连接了起来,使全球互联网覆盖的所有地域发生的所有事件,几乎都可以第一时间传遍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捷、时效性之强是其他媒介所无法企及的。不论是时事新闻,还是社会热点,都能在较短时间内传播到受众群体中。这种强调时效性的信息呈现方式势必会导致信息内容的零散化和碎片化,使得各类事件被具有不同信息偏好的媒介人分解为各式各样的信息片段,致使了解整体事件反倒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

(三)新媒介环境的虚拟性与传播关系的隐秘化

虚拟是一种仿真而非真实的状态。新媒体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在这样的网络空间中,信息存在的状态和传播的方式都是虚拟的。一方面,信息的存在状态是虚拟的,它以声音、图像、文字等形式弥散在网络空间里,类似一种场的存在形式^[6],参与者皆可以匿名发布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是虚拟的。与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接受者十分清楚信息的来源不同,新媒介环境下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均是不稳定的,是可以相互转换

的,因而他们的角色关系是虚拟的、不确定的、充满变数的,双方的信息交流关系是建立在未知的基础上,往往是随机、偶发的,也是不易控制的。正是新媒体空间及信息存在状态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集中于信息本身,而鲜有求证信息发布者与接受者身份的真实与否,自然造成新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主体身份的隐匿化,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网民网络行为的道德责任。

二、新媒介环境的弱控性: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可能遭遇的风险

对于伴随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新媒介环境不仅仅意味着某些工具和技术的变革,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生存和成长环境。正如杜威所说,“青少年在连续的和进步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具有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不能通过信念、情感和知识的直接传授发生,它要通过环境的中介发生”^[7]。然而作为一种具有自在性和不可控性的社会环境,新媒介环境在拓展大学生认识和了解社会通道的同时,所折射出的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无疑也会对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造成一定的误导风险。

(一)低门槛和海量信息易使大学生道德意识淡化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是一个富有内在层次结构的价值系统的动态生成过程,是一个由道德意识到道德理性再到道德责任感的发展性过程。道德意识是大学生在道德交往实践中呈现出的一种以利他性为思维定向的自觉意识,突出的是思维取向的自觉程度,是个体在与社会生活世界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认知和观念意义上的道德意向,环境因素是其重要影响源。

新媒介环境下,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多主体性意味着传统权威机构或媒体的信息发布源头地位正在弱化,“人人皆媒”标示着网络参与主体的大众化。这些变化为大学生接触和认识不同于校园生活的大社会提供了宽阔的通道,延展了大学生的视野和值得反思的生活场域,无疑对大学生的社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媒介信息平台的开放性和低门槛化易造成“众声喧哗”,即“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8],既可能引发舆情误导问题,也可能造成信息的杂乱无序而导致价值共识的销蚀。毕竟低准入门槛使新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不仅传播着大众文化,也为各种小众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土壤。人们在互联网上形成数以万计的因共同兴趣爱好而联结在一起的各种“文化部落”——一个倾

注了时间、感情和欲望的社群空间。一些片面迎合年轻人娱乐喜好但意义缺失的信息充斥于“文化部落”,以“自由”“个性”的名义抢占大学生的精力和时间,使他们自愿“贡献”出自己学习和生活之外所谓的“剩余生产力”^[9],致使部分自控力不足的大学生沉迷于网络消费娱乐的快感中,沉浸在贪图享乐的世界里无法自拔。这种强调“活在当下”的庸俗、享乐型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强化了他们的“自我中心”意识,不仅消解着大学生的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追求,也使“利他”成为一种与己无涉的道德要求,使他们的道德意识趋于淡化。

(二)网络信息的碎片化不利于大学生道德理性的发展

道德理性即道德的合理性原则,是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第二层次,也是道德意识的审慎化。理性是人的认识和行为的合规律性,贯穿于人存在的一切领域。在人的道德活动和道德行为中表现出来的必然性和合规律性,本身就表明人的理性的道德属性。道德意识强调的是以道德性视角来对待道德问题的自觉程度,道德理性则更强调如何行动才更有助于道德行为的实现。因此,道德理性是通过启动个体的理性思维能力,运用社会道德价值的逻辑对道德意识发挥引领作用,提高道德认知能力、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以避免个体在行动中的盲从。

新媒介条件下,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媒介平台所提供信息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10]。Loader等学者提醒,年轻群体的思想认同受到家庭、学校和工作等传统社会纽带的影响越来越小,更多地是通过参与社交网络,在线上的社会互动中完成建构^[11]。就大学生而言,借助新媒介手段获取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但信息的质量和可信度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新媒介技术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瞭望全世界、了解全社会的窗口,让我们足不出户便可走遍天下、阅遍古今。这对以学习为主业的大学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娴熟的网络技术使他们流连于网络世界,从一个页面跳到另一个页面,从一个新媒介平台游弋到另一个新媒介平台,无暇逗留与沉思。网络信息的海量性、流变性、多样性使得浅阅读、浅交流和跟风逐潮成为一种流行的学习方式,也使得“快餐文化”观念蔓延至大学校园,追求知识面的浅表学习逐渐取代追求知识生成逻辑的理性学习,而成为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普遍选择。这种注重速成学习的快捷学习模

式使大学生无暇进行独立思考,反而可能受强大的网络舆论的裹挟而逐渐失却独立思考与理性分析的意愿,进而造成其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尤其是社会道德事件是极易引发舆论风暴的热点事件。面对众说纷纭的网络信息片段,不了解事件真相的大学生如果缺少道德理性参与,其“同情弱者”的“正义”情感就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而成为混淆视听、扰乱社会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同时,道德理性能力不足也易使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在负面道德事件的冲击中逐渐被销蚀,致使其道德观念趋于消极甚至异化。

(三)新媒介环境的虚拟性或致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弱化

道德理性是依据特定的道德价值逻辑认识、理解、分析道德问题的客观思维过程,旨在避免认识和处理道德问题时的盲目与冲动,确保行动策略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但并不一定会驱动个体做出相应的行为。而道德责任感则是激发人们最终做出利他性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因为道德责任感是一种基于对道德的自觉自愿追求而生成的主观责任意识,是一种与人生价值和自我实现密切相关的情感意义上的执着追求,在道德情境中表现为驱动个体做出利他性行为选择的意志力和决断力,故而可以称为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更高境界。

道德责任感是在人际互动、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体验中逐渐生成的,是道德生活主体与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新媒介技术的普及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性交往提供了可能,“这种普遍性交往是人与人之间形成普遍价值观的重要基础”^[12]。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参与网络交往的个体是具有差异性价值观的不同个体,这意味着网络信息中多元价值并存是常态,寻求相互理解、达成价值共识,是形成个体道德责任感的重要途径。然而正如莫兰所说,“有一种常识让我们相信,良好的意愿足以证明我们行动的道德性。然而我们忽视了铁一般的事实,行动一旦开始就会生成新的关系,甚至走向意愿的反面”^[13]。对新媒介技术所创造的网络世界的美好预期终难敌现实的复杂。网络信息主体的匿名性与隐蔽性使得寻求信任与理解变得困难。人们在身体退隐的虚拟空间中交往似乎脱离了现实世界道德责任和伦理规范的约束,信息的可靠性、确定性难以保证。网络空间中的人际交往关系会变得神秘莫测,易于造成大学生的人际信任风险。部分网民为了排解现实生活中的压力或不满,便在网络中随意发布消

极言论,发泄负面情绪,对其他网民造成不良影响。有研究表明,那些持有消极态度的人面对同样消极的线上评论时,其内容接受程度以及继续参与线上讨论的意愿便会增加,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14]。流连于网络世界的大学生在充斥于各种新媒体平台的负面信息的影响下,会对自己坚守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原则产生怀疑,甚或失去道德自信,缺乏践履道德责任的勇气,道德热情和道德责任感在难辨真伪的网络虚拟事件中也逐渐被消磨淡化。长此以往,大学生可能对网络道德事件持冷眼旁观或麻木态度,不利于其道德人格的发展。

三、抵御风险:新媒介环境下高校德育模式的创新

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应对新媒介环境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可能造成的风险,高校需要创新德育模式,扬长避短,使新媒介成为助力高校德育实效的积极力量。

(一)借助新媒介优势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全过程,强化大学生的道德意识

建立以社会道德价值为思维取向的认同意识,是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首要前提。道德能否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关键在于其能否反映社会道德关系的本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是,这种道德究竟能够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则取决于它的传播程度,取决于道德教育实施的好坏^[15]。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价值单向传播方式不同,新媒介背景下,双向互动、多向频动成为价值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方式。移动设备也因此被认为是改变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践和结构的文化工具,将其纳入课堂教学有助于消除个人与集体、理性与情感、学习与娱乐、课堂与课外日常生活之间的隔阂^[16]。因此,高校应正视新媒介环境的双重效应,将新媒介引入教育过程,实现线上线下优势互补。一方面,高校应将立德树人理念融入大学的课堂教学、科学研究、思想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及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构建“直接德育”与“间接涵育”相结合的显性高校德育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新媒介技术平台的便捷性、开放性、广泛参与性等特点,开发网络德育平台,建立网络德育资源库,开设伦理道德热点专栏等,构建网络德育系统,使新媒介平台成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助力器。大学生可以不记名地在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毫无顾虑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

出来,相互交流与讨论。学校不仅可以真正了解年轻大学生的所思所想,准确把握其思想脉搏,而且有助于寻求更契合其认知特点的道德教育策略,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消除思想上的迷障,提升对主流道德价值的认同意识。

价值观的生成与改变都是道德生活主体基于生活实践的主观体验与感受而自主建构的结果,立足于积极的生活体验与消极的生活体验所生成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自然不同。因此,学校除了在真实校园生活中充分保护大学生的正当权益,还需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避免他们被不良言论或消极观念所误导。所以,高校应建立线上线下互通机制,避免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的割裂。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在公共生活中的平等积极互动,包括在线互动、线下互动和线上线下的互动。这种互动越广泛、深入,其人性的展示就越丰富,对个体价值系统所产生的影响就越深刻^[17]。在互动过程中,高校应积极引导大学生认识人性的复杂结构,鼓励他们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与追问中,实现道德境界的升华。

(二)注重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的道德向度,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理性

媒介素养通常是指基于对媒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形成的获取、分析、评价、反思各种信息时的态度和批判能力。大学生新媒介素养即指大学生所具备的基础新媒介知识和技能,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认识、理解、质疑、反思及应用新媒介信息的综合能力,既涉及知识技术层面,也涉及伦理道德层面,是新媒体时代合理、有效地使用新媒介平台和新媒介信息的必备素养,也是避免大学生被网络信息所隐含的消极价值观所迷惑或误导的保障。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强化大学生新媒介素养的培育不仅是应对网络复杂性、增强大学生自主学习与生活能力的本然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大学生道德理性和道德智慧的内在要求,引起了高校的普遍重视。但高校目前开设的媒介素养课程普遍侧重新媒介知识技能层面的介绍,对于人的态度、情感等伦理道德向度较为忽视。而新媒介这一越来越复杂的物理装置,恰恰可能是造成人的心灵迷茫和精神世界失序的渊藪^[18]。正如 Meyers 所述,媒介素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利用信息技术完成基本搜索任务,而是有效参与数字世界^[19]。因为无论是对新媒介信息的解

读、批判还是选择、利用,都会受到个体道德价值观的定向和规约。因此,注重媒介素养的道德向度是高校媒介素养课应有的关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不应局限于掌握数字知识和操作技能,更应使他们理解数字信息系统中人、技术、社会的相互关系和行为模式,启迪其道德理性,智慧与德性并用,引导学生全面、辩证地看待新媒体中的复杂信息,理性地选择和运用网络资源,避免被碎片化、虚假化的信息所误导而产生误判行为。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网络舆论方向,使大学生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升华其道德责任感

康德指出,“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20]。可见,道德责任感是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道德社会化的本体追求。而新媒体技术在其强大的功用性外表之下,也隐含着巨大的伦理风险。大学生在追逐新媒介的工具价值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多元复杂、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所映射的价值观念所浸染,独善其身的个人价值逐渐超越了公共价值,自利取向遮蔽了利他取向。此类价值观逐渐耗损着大学生的道德热情和道德敏感性,道德也越来越成为指向他人而与己无涉的外在客观规范,道德责任感自然难以生成,助长了现实中的道德冷漠。改变这一状况仅靠课堂中的直接德育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真正触动学生心灵世界的道德生活环境的浸润,在真实体验中、在理性反思中建构自己的道德观。因为大学生是具有较成熟道德认知能力的知识精英,惟有直抵心灵深处的无言之教,才能融入他们的价值系统成为改变其处事态度和价值观念的真实力量。因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建设优质的校园道德生活环境,以文化环境的浸润效应滋养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道德自信,从而增强其道德责任感,激发其自觉抵御异质价值观侵扰的定力。

新媒体环境下之所以产生价值混乱和价值失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公众在工具理性主义侵扰下失却了应坚守的道德信仰而产生了价值迷失。因此,必须回到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血脉中寻找智慧,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网络舆论方向,让优秀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与普及成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一方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在依法对网络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规范化管理的基础上,创新网络话语情境,以独特新颖的网络板块设计展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承载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成为校园网络主体资源,微信公众号、微博、贴吧等深受大学生喜爱的媒介平台成为传播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技术了解大学生的网络行为特点和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为其提供价值引导,让学生成为创建文明和谐、开放包容的校园文化的主体力量。因此,学校应结合新媒体时代特性,在充分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与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将“生本”思想贯穿于立德树人全过程。一是通过优秀文化进校园、进课堂活动,让学生在“美善合一”理念熏陶下自觉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格完善。二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制度管理过程,尤其在学生管理方面要更多地听取学生的意见,不仅使制度规范更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有助于他们主人翁意识的激发,升华其责任感。三是以学生为主体组织开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园文化活动,凸显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和参与的广泛性,让所有的学生都真正成为学校生活的主角,从而使大学生在参与校园文化活动中,形成进取的思想观念、健康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产生对学校文化的自觉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进而生成主观道德责任,使其身处虚拟情境时,仍能够保持头脑清醒,能够理性研判,以免被不实信息所牵制和蒙蔽。

参考文献:

- [1]李德显等.我国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52.
- [2]杨淑萍,张雅楠.从自然人到道德人:青少年道德人格生成的省思逻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8,38(34):44-46.
- [3]张朱博.新媒体环境下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25-130.
- [4]郭红霞.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非正式学习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3):27-32.
- [5]鲍宗豪.网络与当代社会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20.
- [6]张 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探析[J].高教探索,2016,154(2):118-123.
- [7]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8.
- [8]胡 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 [9]曹 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9(5):

- 39-47.
- [10]Lippmann W, Curtis M. Public Opinion[M]. New York:Routledge, 2017.61.
- [11]Loader B D, Vromen A, Xenos M A. The Networked Young Citizen:Social Medi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M]. New York:Routledge, 2014.13.
- [12]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223.
- [13]埃德加·莫兰.伦理[M].于硕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7.6.
- [14]Lee M J, Chun J W. Reading Others' Comments and Public Opinion Poll Results on Social Media: Social Judgment and Spiral of Empowerment[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65): 479-487.
- [15]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9.449.
- [16]Figueras-Maz M, Masanet M J, Ferrés J. Mobile Devices in Higher Education: A Pending Issue in Multidimensional Media Literacy[J]. Catal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Cultural Studies, 2017, 9(1): 135-144.
- [17]杨淑萍.公共精神的生发逻辑及青少年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J].教育研究, 2018, 39(3): 27-34.
- [18]杨淑萍,何明炳.新媒体信息质量对青少年公共意识影响的实证分析[J].教育科学, 2020, (4): 22-28.
- [19]Meyers E M, Erickson I, Small R V. Digital Literacy and 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An Introduction[J].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2013, 38(4): 355-367.
- [20]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15.

作者单位: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辽宁 大连
邮编 116029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Socializat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Moral Education Countermeasures

YANG Shu-ping, ZHU Xing-chen

(School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moral socia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natural requirement of individual adults, but also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constitutes the era background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socialization. The low threshold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the hu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tend to weaken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fragmentation of network inform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 rationality. The virtuality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may weaken college students' moral responsibility. Universities should carry out the moral education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new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pay attention to the moral dimension of college students' new media literacy to enhance their moral rationality, and sublimate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enhancing their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moral rationality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guiding the direction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o consciously resis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nd realiz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moral personality.

Key words: new media environment; college student; moral socialization; moral consciousness; moral dimension; moral rationality; sense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moral personality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多维逻辑

■ 韩玉璞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立德树人任务的顺利达成以及促进思政课的内涵式发展,都离不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包括教师主导性主体,学生自主性主体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协同性主体三个维度。在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课程建设理念应注重统一性与差异性并重,教学方式方法应注重系统性与多样性并重,教学资源载体应注重共建性和共享性并重,教学评价应注重科学性和全面性并重,思政课教师自身发展应注重专业性和连续性并重,制度构建应注重创新性和灵活性并重。

关键词: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教师;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27-04

党的十八大以来,思政课在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所受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诸多因素,本文拟从理论、主体、实践三个维度进行探讨。

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论逻辑

大中小学思政课是基于深厚的理论基础开展一体化建设工作的,需要从不同理论视角来阐释一体化建设的渊源。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继承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思想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德育思想。其主张以仁爱为核心,仁者爱人,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界万物和谐相处的大同社会。儒家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中德育思想尤其强调道德规范,要求个人要自省内修,以“内圣外王”为理想人格,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次目标,其中不乏螺旋上升的德育目标。对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研究,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传统儒家思想不仅提倡“内

修”,也强调要进行大量的实践,实现知行合一。孟子提倡“思诚”,认为自我修养要通过丰富的社会实践逐渐完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如“内省”“躬行”等,为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培养是教育最根本的目的。马克思提出,教育要结合生产劳动。其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提出“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的观点,认为“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必须经过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这充分说明,人们活动的有效性需要把劳动或者实践作为自身的核心要义,而劳动教育正是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认识系统是由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和认识工具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首先,认识主体始终受到年龄及现实生活等因素的制约,对事物的认识总会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认识主体也会受到相应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其

作者简介:韩玉璞(1968-),男,河南安阳人,安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次,认识客体也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着。这为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认识路线。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的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思政课的实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教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要针对青少年成长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内涵丰富,既包含深邃的教育思想,又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既讲是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么干,为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四)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

思政课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是集中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课程,也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直接影响着立德树人的效果。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必然也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坚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连贯性、思想政治内容结构的完整性和课堂教学的系统性。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其运动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4]。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4]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的规律^[4],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律。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揭示了教育对象思想品德的形成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能够被外力加以干预的过程,这就要求大中小学要循序渐进地开展思政课教学。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具有系统的整体性、有序性、内部结构的优化等特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既表现在明确目标、落实内容、制定措施等环节的有机结合,也包括党政部门、学校、社会、家庭等主体要素的协同发力,还要求学前、小学、中学和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各个子系统之间有序衔接、相互贯通,形成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的发展过程,进而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践合力。

二、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主体逻辑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顺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建设主体的特性。只有明确各参与主体,并将主体间的强大合力效用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切实做好当代学生以及后代学生的教育工作。

(一)教师主导性主体

“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了一体化建设工作的开展,思政课教师是关键性主体,其主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整个建设工作都需要凸显思政课教师的引领价值。所以,思政课教师在推进一体化建设工程时,应进行精准定位,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也是思政课教师专业发展必备的品质。同时,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由课程、教学、理论、实践等各体系入手进行积极学习与实践,明晰肩负的使命,敢于创新创造,灵活调整并优化教学策略,为一体化建设工作的开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将自身在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二)学生自主性主体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人”的主体就是大中小学的学生。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必须明确学生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注重引导学生自主探索新知识,除了要进行思政知识传授外,还应对学生多加启发,凸显学生的自主性,让其能够自行发现、思考与解决问题,并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形成正确的观念。让学生有更多探究与发言的机会,提高自学的能力,是立德树人任务达成的关键所在,也是学生形成终身学习意识以及提升社会竞争力的根本。教师必须转变观念,将课堂真正交还给学生,赋予其更多的自主性。

(三)家庭、学校、社会等协同性主体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主体发挥合力效用,更好地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应注重将学校与家庭教育关系进行协调,加强双方沟通,紧密关注学生的成长状况,将双方协作在立德树人目标、优秀文化弘扬等方面的效用充分发挥出来,使思政教育的推进更为顺利,进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同

时,还可以专门组建家庭教育专家队伍,由学校教师与社会中该领域的优秀人才组成,定期安排专家队伍进入到社区、家庭中,提供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法,引领家长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为家长进行答疑解惑,使家校能够实现高效协同,让学生能够在积极健康的氛围下自主学习、健康成长。

三、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根据新时代发展和学生成长的特点,在课程理念、教育方式、教育内容、队伍建设、教育资源等方面不断实现守正创新。

(一)课程建设理念注重统一性与差异性并重

课程建设理念既要有统一性,又要体现差异性。一体化建设理念引领着大中小学思政课的具体教学方向。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思政课教师要坚持统一性原则,即在每一个阶段,思政课教学都要切实遵循学生的发展规律。在小学阶段,要让学生把握“知”的要求;在中学阶段,要让学生把握“情”的要求;在大学阶段,要让学生把握“思辨”的要求。同时,教师还要结合思政课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定位,使不同学段的思政课教学在统一中有差异,差异中有衔接。处于不同学段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认知能力,但无论是处于哪个学段,教育工作的开展都是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基础目标。小学阶段主要对学生实施道德启蒙,中学阶段主要让学生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大学阶段主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

(二)教学方式方法注重系统性与多样性并重

教学方法直接影响着教学目标的实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逐步推进,应具有系统性。小学生的年龄较小,可用故事教学法进行引导;中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可用议题式、探究式方法进一步引导;大学生已经具有了独立的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可多采用讨论式、实践教学等方式。各学段教师应合理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同时,话语体系表达要适应各学段学生发展的需要,用学生喜闻乐见的话语和新时代话语进行交流对话,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适应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水平。

(三)教学资源载体注重共建性和共享性并重

思政课教学资源载体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基本要素,其主要包括教学基地、教学内容、教师、图书资源、校园文化等,建设工作的开展应将各相关资源进行整合,展现各方的力量。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必须对思政教育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建立协同机制,突破各层级的壁垒,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开放性的资源共享平台,使大中小学教师都可在平台中共享全部教学资源,线下也可共享实践场所,实现所有资源的最大化共享。各级学校都应积极整合教学资源,建立畅通的资源使用通道,使所有思政课教师获得的教学资源都非常丰富,为教学的开展提供强大助力。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应对思政课实践性引起高度重视,注重将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进行融合”。所以,在一体化建设工作开展时,各参与主体应在实践育人中积极落实共建共享工作,形成强大的实践育人推动力,为实践育人一体化目标的达成做好铺垫。

(四)教学评价注重科学性和全面性并重

评价工作是各阶段思政教育开展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思政课教师需要对该环节进行重新认知,确保相关工作能够更为顺利地展开。实施一体化评价,关键在于明确相关目标、教育功能、参与主体、学习内容,确保覆盖所有内容,由此制定全面覆盖的指标体系,以便实现各学段评价内容的合理性,全面提升教学评价效果,及时进行后续相关内容的调整,使建设成效不断提升。对评价目标分析时,应科学延伸评价视角,构建各学段协同育人的体系,显著提升思政课的合力育人成效。严格依据相关部门发布的系列文件,建设系统化的评价标准,发挥政治统领作用,引导一体化建设工作顺利开展。从主体来看,既要管理主体统筹一体共同评价,使评价具有客观性,又要由教师主体进行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从内容上看,既要对教学要素进行评价,也要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进行评价。

(五)思政课教师自身发展注重专业性和连续性并重

思政课教师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建设效果如何与思政课教师本身的素质、专业能力、道德水平、政治素质等有着紧密联系。思政课教师必须重视自身专业性的发展,对大中小学思政课程的知识体系有连续性、全面性的理解,加强协调配合,实现共同发展,才能避免不同学段教师的各自为政。一要注重知识积累,不断迭代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专业修养,构建完备的知识体系。二要强化同伴互助,不仅进行同学段的教师交流,也要强化大中小学各个学段

的教师交流,相互分享教学资源与经验,形成不同学段教师集体备课制度。三要注重专业引领,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资源为个人专业发展的连续性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

(六)制度构建注重创新性和灵活性并重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要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全面育人的长效机制,统一管理 with 分类管理、分层设计双向互补。要联合各部门进行共管共抓,共同为一体化课程建设助力。同时各级科研主管部门要大力支持一体化建设研究,以科研引领一体化建设。要提供充足资金,完善奖励机制,奖励在该领域“有所为”的思政课教师,提高其积极性。要搭建交流平台,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间以及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常态化交流与探讨。要保证充足的思政课师资,并确保其有充足的时间开展一体化建构研究与实践。

总之,开展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既要有坚定的理论自信,又要有厚实的理论根基,还应继续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挖掘。开展新时代大中小思政

课一体化建设,需要教师主导性主体、学生自主性主体以及家庭、学校、社会等协同性主体作用的积极调动与发挥,在课程理念体系、教育方式、教育内容、队伍建设、教育资源等方面不断实现守正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进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育出符合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0.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0.
- [3]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2.
- [4]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9.123.127.

作者单位: 安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安阳 邮编 455000

The Multi-Dimensional Logic of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HAN Yu-pu

(School of Marxism,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successful achievement of the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cludes such three dimensions as teachers' leading subjects, students' autonomous subjects and cooperative subject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As for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un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concept of course construction, to systematicness and diversity in teaching methods, to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n teaching resource carriers, to science and comprehensiveness in teaching evaluation, to professionalism and continuity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self-development, and to innovation and flexibility i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new era;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teachers; students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路径思考*

■解 萌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对法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思考和历史性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高校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场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阐释的重要力量。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为推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使命的时代新人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立德树人的组织保障;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建设,畅通立德树人的主渠道;发挥校园日常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立德树人的全方位育人态势;培养卓越教师队伍,夯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的基础,使得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取得实效。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学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31-04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也是推动立德树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1]。高校作为立德树人教育的主阵地之一,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将其有效融入到立德树人教育的过程之中,培养品德与才能兼备、品德与法律兼修且素质一流的法治人才,快速推进新时代高校育人机制的全面发展意义重大^[2]。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及理论品格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的,其中包含的“十一个坚持”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最核心要义,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品格

1. 坚持与时俱进,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法学原理、方法论和价值论。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有益探索^[3]。习近平法治思想基于新的实践形势,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形式与内容、当前与长远等有机融通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时代之问,是富涵时代价值的原创性和集成性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传承和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2. 坚持中国特色,创新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

* 本文系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校立德树人教育中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1ZX019)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解 萌(1990-),女,山西运城人,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教师、硕士,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中国实际,提出了重在强调法治建设的核心保障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正确认识和把握党与法的关系;坚持人民是法治建设的根本主体和中心地位,彰显我国法治人民性的根本优势;坚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体系等浓缩了我国法治建设实践和成就的精辟论断,是引领我国新时代发展的科学法治理论,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根本的行动遵循。

3.坚持问题导向,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法治思想紧扣全面依法治国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注重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推动法治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同时,习近平法治思想历经实践的反复检验,在统筹发展中,突破一个又一个核心问题,从2015年“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的八个方面,逐渐发展充实到2018年“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十个坚持”,再深化拓展到2020年的“十一个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锤炼锻造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建设进程的深入推进,必然会在问题的探索、发现和解决中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和拓展^[4]。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遵循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科学指引。因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高校立德树人教育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教学活动,更是一项崇高的政治任务。

(一)明确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为推动新时代高校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法治人才,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主动适应新时代要求,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地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效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全过程,切实发挥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高校立德树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保障功能。

(二)丰富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为马克思

主义法治理论的推进作出了巨大的且具有创造性的贡献。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引领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思想旗帜,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效融入高校日常的立德树人教育之中,在弄通、学懂、悟透、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改革创新,破解高校立德树人教育中的困难和矛盾,形成更加完备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实效,丰富了我国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理论内涵。

(三)灵活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育人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巩固国家根基,树立文化自信,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全过程,有助于灵活育人方式,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态势,同时注重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提升育人质量,开创育人新格局,引导当代大学生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鲜明的人民立场,更加坚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

(四)确保高校立德树人目标的顺利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扣准高校立德树人教育,创造性地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面临着如部分教育重形式轻实效、人才培养重专业轻思想政治素质等因素的制约,探索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布局、有层次、有效率地融入高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通过强化组织领导和思想共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完善课程创新等形式^[5],注重指引大学生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大学生真正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坚定地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和传承者,保障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落实取得成效。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效融入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强化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组织保障

党的领导是办好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首要原则和根本保障。要加强党对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全面领导,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事业的杰出建设者和卓越

接班人。首先,坚持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6]。高校党委要加强对高校工作的管理,总揽高校立德树人全局,把握高校发展的政治方向,在经费保障、人员配备、活动场所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及时帮助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落实立德树人作为最高目标、最大责任、最终使命,引领推动高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实现高质量发展^[5]。其次,着力抓好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在推进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以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师生,进而形成推进立德树人教育的强大合力。最后,建立健全立德树人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理论研究,丰富完善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制度规范体系,加强工作的知识化管理和标准化建设,构建在学习资源、经费投入、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有效制度保障,综合运用党政评价、师生评议、第三方测评等方式,建立健全高校立德树人工作评价考核制度,推进高校治理的现代化^[7]。

（二）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建设，畅通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主渠道

一要开好“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专门课程。《法学类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年版)》明确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纳入法学专业核心必修课。要注重用习近平法治思想铸魂育人,深挖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和“情”,着力从学理上把这一伟大实践理论讲彻底、讲透彻,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引导大学生感悟真理思想,坚定理想信念。二要推进实践教学。加强校企、校地、校所、校检、校法等合作协同育人,将法治实务资源、将法庭庭审等实务的信息化资源通过线上直播、录播等方式实时接入高校,将更多的专家引进到高校,担任实务导师,直接参与课程体系设计、专业教学等活动,更好地把习近平法治思想实践中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堂中^[8]。三要探索面向非法学学科的高校大学生,打造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党课”“微课”“金课”等一批优质课程资源,增强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理论认同,强化思想引领。四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到专业课程之中。立足于各学科的专业属性,在尊重每一个专业学问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进一步转化为具有优势特色的教学资源,更新教

学内容、提升学术内涵、完善课程设计,找准专业知识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契合点,推动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只有在专业课程中“有感而发”“由内而外”,才能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悟透其中的实质,增强行动自觉,确保课程的育人效果^[2]。

（三）发挥校园日常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全方位”环境育人态势

一要挖掘校园文化建设资源,实现环境育人,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有机融入法治元素,建设校园园区、宿舍、食堂、场馆、教室、图书馆、校史馆、展览馆等特色育人阵地,实现建设法治广场、法治走廊和法治宣传栏等校园文化的载体。同时,利用校园主流媒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发挥校报、广播、官网等宣传阵地作用,让习近平法治思想精神深入师生,实现环境育人、文化育人,推进立德树人目标的落实。二要加强“第二课”建设,实现导向育人。首先,以重大节日、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通过组织法治中国国情系列主题教育、学生读党报、演讲比赛、读书会、研讨会、新时代先进人物进校园、论坛讲坛、讲座报告会、优秀校友访谈等贴近学生需求、内涵丰富的文化活动,组织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宣传学习,用灵活多样的形式,吸引大学生的关注和参与,寓教于乐、寓学于乐。三要充分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一直以来,学生社团都是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繁荣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高校要加强对学生社团方向性指引,鼓励社团将习近平法治思想教育与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有机结合,在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更好地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四）培养卓越教师队伍，夯实高校立德树人教育的基础

第一,提升专业素养。高校要进一步完善教师培训体系,支持教师定期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务专业培训;搭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团队,深入开展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研究和课程教学研究,自主开展相关课题研究;举办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系列研讨会。使高校教师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深入学习和积极践行者。只有教师真正学懂、学深、学透、融会贯通,以身作则积极践行,才能引导当代大学生产生价值认同感,真信、真学、真用。第二,强化授课技能。教师要加大教材研讨,深刻把握教

材的编写思路和鲜明特征,全面把握教材的体例结构和教学目标。同时结合经典案例、时政热点,联系实际找准切入点,紧扣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善于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注重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积极运用小组研学、情景展示、课题研讨、课堂辩论等方式组织课堂实践。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内涵、精髓、要义、逻辑关系等核心内容有机融入自己承担的课程教学内容之中,带着信仰讲、带着感情讲、带着真知讲,讲鲜活、讲透彻,实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技能提升,使得习近平法治思想真正地入心入脑。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作为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直接关系“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党和国家教育始终关注的根本问题。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课程建设,发挥校园日常教育主阵地作用,培养卓越教师队伍,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更有效果和效率地纳入高校坚持德育为先、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当中,创造完全地、饱满地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的高地,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吴岩.培养卓越法治师资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J].中国大学教学,2021,(6):4-5.
- [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106/t20210602_535109.html.
- [3]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21,(3):11-18.
- [4]王东.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三个维度:结构样态、内含特质、时代意义[J].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2021,(5):44-45.
- [5]雷卫平.高校立德树人的时代价值与践行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4):88-90.
- [6]楚国清.大力提升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成效[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1-6.
- [7]王智超,尹昊.高校教师立德树人的困境根源、认识澄清与实践进路[J].高校教育管理,2021,(2):75-82.
- [8]马怀德.法学教育法治人才培养的根本遵循[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12):50-53.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青海 西宁 邮编 810008

With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Path Thinking

XIE Meng

(College of Law and Sociology,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is formed in the practice of governance and a series of strategic thinking and histor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n important field to carry out this thought and an important force to study and interpret it. Guided by this important thought, it provides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build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new people to take on the miss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 the organizational guarantee of moral cultivation. Give full play to the main role of campus daily education, and build an all-round education situation of moral cultivation; Cultivate excellent teachers, tamp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cultivating people, and make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chieve actual results.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ollege students;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论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辩证关系

■潘丽芬

摘要: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用关系,致力于解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两者的融通需要置入“一”与“多”、“分”与“合”、“红”与“专”的辩证关系之中。在“一”与“多”的关系中,阐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要求;在“分”与“合”的关系中,说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视角;在“红”与“专”的关系中,透视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

关键词:高校;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融通;辩证关系;“分”与“合”;“红”与“专”;“一”与“多”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35-04

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1]。红色文化具有典型的革命教育特征,对人们的思想、情感、心理、行为具有熏陶、培塑、引导功能,既反映了红色基因的文化形态,又以伦理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作为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知识或观念,红色文化离不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土壤,“实现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融合,必须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理论引导作用”^[2],解决红色文化在思想引领方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什么”的问题。融通即为融会贯通,表示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用关系。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关系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红色文化理论引导的功能评价,也直接关系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效力。

一、“一”与“多”: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实践要求

“一”主要是指一个思想,“多”主要是指在这个思想作用之下的生活实践方式。从时空意义上讲,红色文化以内容、方式、功能的变化来反映思想对其作用和影

响。思想对红色文化的作用范围是既定的,不仅构成对其所处时代精神的把握,而且在文化延续过程中构成对上层建筑的总体理解。因此,思想必须贴近现实,必须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唱响时代最强音,成为主旋律。

“一个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调研考察红色资源地和瞻仰革命历史纪念馆,反复强调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红色基因在治国理政、领导干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形成了内涵丰富、结构完整的红色文化相关重要论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科学理论指南。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需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诠释红色文化,讲清楚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尤其是要阐释清楚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内涵和价值,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红色文化理解框架,以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提升。第二,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构红色文化的时代坐标系,推进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转换,使其在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过程中孕育和生发新的思想、观念和内容,进而提

作者简介:潘丽芬(1974-),女,浙江永嘉人,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升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的话语生产力和传播力,建构具有强大理论解释力、号召力、引领力的话语体系。第三,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红色文化引申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使人们形成关于红色文化的生活意识,推动红色文化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力量的汇聚和融合,扩大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作用范围,走进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推动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各领域的全面融通。

多种生活实践方式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在政治生活方面,红色文化的政治立场、政治属性、政治原则、政治要求,是其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实践原则,要在尊重历史和事实的前提下,用光辉灿烂的文字记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过程中取得的一系列精神文明成果,使之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并成为后者的重要内容。在经济生活方面,红色文化要借助物质力量将自身转化为一种必要的理想信念和道德精神支撑,将其内在蕴涵的矢志不渝、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伦理精神内嵌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与各环节,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提供动力保障。在文化生活方面,红色文化除了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之外,还要以自觉的态度引领其他文化生活健康发展,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入鲜活的文化力量,进而筑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阵地,防止文化虚无主义、文化消费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对高校文化生活的侵蚀和诱导。在社会生活方面,红色文化要在思想、历史、事实中引导人们形成良善的生活态度,立足社会生活根源,深入阐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重要范畴,在反思性、批判性、建设性的基础上,焕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勃勃生机。

“一”与“多”指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多生活视域。红色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往往借助政治叙事方式对人们的价值观施加影响,赋予红色文化以政治属性的表达逻辑。客观而言,这种表达逻辑有利于将红色文化上升至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使其成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和奉行的政治准则或道德要求。然而,红色文化除了在其政治属性和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有着非同凡响的作用之外,还可以在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人的本质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对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多生活视域

提出了要求,即红色文化除了要紧密联系主流意识形态并呈现一定的政治属性之外,还要立足日常生活世界给人以足够的精神慰藉,在红色文化遗存中唤起人们对内心深处精神大厦的渴望与重建。因此,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要辩证看待“一”与“多”的关系,立足人民群众的微观生活深入考察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实践要求。尤其是需要在诸多生活领域对红色文化进行多维度解读和重构,使红色文化的功能、价值立体阐发在多生活领域,为寻求多生活领域的融通路径提供思路。

二、“分”与“合”: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理解视角

“分”主要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把红色文化发展历程划分为不同阶段。红色文化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特征和功能。“合”主要是指以情境构造的方式将红色文化涉及的人物、事件统一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不同阶段的红色文化包含不同的人物和事件,其都可以用不同的情境方式再现历史故事,渲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育人氛围,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话语权。

“分”用历史眼光审视红色文化以建构不同的诠释架构和叙事模式。划分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基本原则,这是贯穿其中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诠释架构和叙事模式都不能对其进行否认或者改写。第一,红色文化发展历程要始终如一地将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尤其是将参与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能动力量充分彰显出来,确立人在整个红色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功能。这是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并重新理解人的问题的关键线索,为后者“培养什么人”指明了方向。第二,遵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审视红色文化发展历程,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红色文化的特点,运用具有时代特征的诠释架构和叙事模式来进行话语表达,以凸显红色文化话语的解释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是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并实现话语创新的核心议题,为后者“怎样培养人”指明了方向。第三,红色文化发展历程的历史分期要明确表达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认同,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展开说明,赋予红色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蕴含。这是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重要前提,为后者“为谁培养

人”指明了方向。

“合”将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文化统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从价值实现过程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力量,是一种基于大学生日常生活实践的价值化过程。也就是说,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育人力量,关键在于其可以直接作用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过程,并对其人格塑造、情感化育、价值引领方面产生指导意义。“合”需要将红色文化发展历程中零散的人物、事件组合成为一个清晰连贯的故事,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资源支撑,这可以在更长时间、更广范围内贯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始终,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复述红色文化历史,从而形成不同的历史叙事,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历史温度。统合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确立渐进式的实践策略,洞察历史叙事背后的不同动机,在视角比较、主题比较、动机比较、叙事比较的基础上,将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文化资源统合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并针对性地为后者提供资源支持。

“分”与“合”说明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解与把握。“分”与“合”提供的是一种框架式思路,引导人们如何把红色文化转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一,正确理解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语境,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的来剖析红色文化的发展历程,确立不同历史阶段红色文化的育人坐标,以此来观察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育人的一致性和同步性,达到一种真正的融通关系。其二,正确理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红色文化的问题诠释,以问题的方式向教育对象诠释红色文化“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在问题求索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红色文化育人生态体系,客观上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实际效果。其三,注意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关系的完整性和整体性。完整性是指红色文化发展历程各个阶段有一定的关系结构,整体性是红色文化要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用范畴。

三、“红”与“专”: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的目标指向

“红”主要是指红色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专”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专

门人才中发挥育人作用,通过红色文化来建构专业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气质。

“红”以红色文化的政治品格凸显主流意识形态意涵,在实践关联中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视野。红色文化的“红”,实际上就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方式指向红色文化的政治品格,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红色文化来揭示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规定。就融通关系而言,“红”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学校环境、学校实践对大学生展开教育,引导大学生对红色文化形成客观、正确、理性的认知态度,使大学生在红色文化的价值引领之下,不断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包含的意义进行新的诠释。第一,“红”要在本质上使大学生整体认识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关系。红色文化内在包含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前提,体现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价值追求,不论红色文化有什么样的内容呈现,其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都需要围绕培养人的问题展开实践探索。第二,“红”要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对一切不利于红色文化传播的消极因素进行有力反击,捍卫红色文化的政治立场和育人目标,使红色文化的内容与形式都能够准确把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需求,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范畴将其充分表达出来,确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的价值方向。第三,“红”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与各环节建立真正属于红色文化的概念体系,明确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文化人过程的概念、内涵、目标和指向,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野回答红色文化育人的根本性问题,把握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关联。

“专”以专业课程来阐释红色文化的政治立场和育人主张,把红色文化涉及的价值、意义、信仰同专业课程相融合。专业课程有其固有的研究对象和问题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专业课程就与红色文化价值无涉。从课程讲授过程来看,专业课程包含对特定领域的问题审视和价值追求,通过专业内容使大学生得到认识、理解和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生需要将专业内容的理解蕴含在课程实践之中,而课程实践的展开则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在科学知识体系内统筹考虑专业课程涉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具体来说,专业课程可以通过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来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维,在对自然、科学、社会、宗教、语言、艺术、生态等问题的理解和探索中,通过价值观念的方式形

成对当代科学实践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基本看法。专业课程对红色文化的吸收和运用,并不是要全盘嫁接红色文化的内容和形式,而是在课程讲授过程融入红色文化所秉持的政治立场和育人主张,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在勇攀学术高峰过程中要不忘初心,自觉把红色文化的精神气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英雄模范的临危不惧、坚韧不拔、团结奋进、勤俭自强的美好品德,用以重构和更新自身的精神世界,在开拓精神世界空间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与能力,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红”与“专”从育人目的和指向的联系中去分析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问题。概括地讲,“红”与“专”都涉及对育人目的和指向的描述,都可以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因此,从“红”与“专”的角度理解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问题,实际上就是立足大学生的培养目的来进一步思考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问题。关于育人目的,“红”凸显的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专”则是对这一群体的专业技能进行纵深拓展,使其掌握专业化的教育知识和技术能力,从而更好地为

“红”服务。关于育人指向,“红”要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这些人才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主体;而“专”则要求参与主体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不搞闭门造车、不搞固步自封,而是以专业的精神、专业的态度、专业的能力投身于火热的、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尽管“红”与“专”不是直接体现在以文化人的具体过程中,但其却以鲜明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各种认识实践活动,引领着人与世界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必须自觉体现在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通中,在对育人问题的理解中科学把握“红”与“专”的辩证视域,更好地展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丰富内容、内在区别和相互联系。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18.
- [2]曾杰.论红色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时代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5):48-50.

作者单位: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贵州 贵阳 邮编 551400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Culture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PAN Li-fen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uiyang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 and me, which is committed to solving the “last-mile” problem of colleg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needs to be put into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many”,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redness” and “specialization”. We should clarify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 and “many”, explain the understanding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see through the goal of the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e and colleg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ness” and “specializ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red cultur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accommodation;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separation” and “combination”; “redness” and “specialization”; “one” and “many”

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黄锁明¹,李丽娟²

摘要:深入开展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对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工科人才至关重要。当前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中存在着课程思政目标聚焦度不够、课程思政元素选择精准性不够、课程思政资源建设供给度不够、教学方法改革性不够等问题。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应以全局思维确立课程思政目标,以引申转化融通课程思政内容,以多重维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以量身定制设计思政授课方式。

关键词:新工科;课程思政;课程思政目标;课程思政内容;课程思政资源;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39-04

新工科建设是我国实现教育强国的战略支撑,正在重塑我国的国际竞争力^[1],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新工科人才是当前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除专业能力和通用素质外,新工科人才必须具备科技报国情怀、跨学科和系统思维等新工科的素养^[2]。课程思政是实现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但当前的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还存在与传统工科同质化的现象,聚焦新工科特征的课程思政研究不够深入。本文从新工科的本质特征出发,剖析当前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当前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的现实困境

课程思政教学首先应设定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由此确定具体教学内容,然后根据思政内容多角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再以更强的针对性将思政资源付诸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最终实现新工科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一)课程思政目标设定聚焦度不够

新工科源于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对高校培养人才的迫切需求,涉及的专业重点面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领域,关系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新工科人才既要具有应对产业技术变

革的前沿知识和精湛技术,又要具备科技报国的理想、创新创业能力、跨界融合能力等综合素养,而这些知识、能力、素养需要对专业课程各有侧重、循序渐进地传授和培养,有些能力如跨界融合能力还需要多门课程联合培养。当前,各高校新工科课程虽然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课程思政教学,但是课程思政目标往往从易于挖掘课程思政资源的角度由任课教师自行确定,缺乏系统性与专业性,导致对学生必须的新工科素养的培养不够聚焦。

(二)课程思政元素选择精准性不够

确定课程思政目标后,应设计与思政目标相适应的思政元素。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课程思政的内容重点从五个方面展开^[3],其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党和国家事业的行动指南^[4],必须强化其在课程思政内容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教材委员会2021年印发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也指出,自然科学课程教材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育人立意和价值导向。建设新工科既有应

* 本文系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项目“基于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自动化新工科培养体系”(项目编号:2017JSJG130)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1.黄锁明(1978-),男,江苏泰州人,南京工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李丽娟(1976-),女,山西吕梁人,南京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与控制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工科专业建设、工业大数据分析研究。

对新兴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挑战的现实考量,更是加快我国发展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谋划^[5]。与传统工科相比,新工科建设与新思想的时代融合度更高,对学生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更为迫切。此外,承担新工科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的理论学习不足,理解尚不深入,知识储备不够,在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时不能恰如其分地将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知识有机融合。

(三)课程思政资源建设供给度不够

为了促进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课程思政内容,需要在教学中展现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使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并心领神会。新工科课程多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前沿性工科课程,新兴技术的学科历史短,典型成功实践案例和鲜活人物传记少,难以从成功的应用案例和故事中引申出思政教学元素,使得当前新工科课程思政资源相对比较贫瘠。此外,由于新工科的课程思政教学强调开拓创新、跨界融合、科技报国等相对高层次的思政目标,往往需要一门课甚至几门课的系统培养和综合训练才能达成,思政案例也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应用。而当前新工科的交叉融合很多尚处于概念和研究阶段,成熟的应用案例欠缺,给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挖掘造成一定困难。因此,在当前新工科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两张皮”的现象比一般工科课程更为常见。

(四)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改革性不够

教学实施是课程思政教学的最后一公里,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教师设计的课程思政内容、资源,还要依靠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新工科的典型特征是创新与交叉,技术一直处于不断快速发展中,其课程思政资源往往不像传统工科课程那样成熟。因此,应针对新工科课程思政资源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开放性特征来设计专门的教学方式,重点引发学生对新技术的探索兴趣,在探索和体验中逐步接受思政教育。当前,新工科的课程思政教学大多采用教师在课堂上单向度授课的“一言堂”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一以贯之地将注意力集中在课堂,难以有效接受课程思政内容。虽然也有部分课程采用了双向“讨论式”的授课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单纯“一言堂”的缺陷,但是受教师视野限制,当前的新工科课程对于创新创业、跨界融合等高级思政目标的主要教学方法仍不能内化为学生的切身体验,导致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仍不理想。

二、新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路径

(一)以全局思维确立课程思政目标

对于每一门课程来说,应明确其在综合素养养成中的任务以及前续后继课程的作用,进而确立具体可操作的课程思政目标。

首先,新工科专业有一些共通的思政目标,如培养家国情怀、开拓创新、全球视野、职业素养等素质。然而,不同的新工科专业也有不同的课程思政目标,不同的专业定位也会需要不同的课程思政目标,教师只有理解清楚课程所在专业的定位和思政目标,才能对自己承担课程的思政目标做出合理的定位,科学支撑所在专业的思政教学目标达成。

其次,教师应明确自己承担的课程是为专业课程思政总目标达成做出的努力。课程思政所培育的某一项素质养成,都不是在一门课中通过一两次课程思政教学就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在几门课中系统化地逐步提升,或同时在几门课中交叉融合综合锻炼。因此,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应深刻明晰自己所任教的课程在整个专业思政中的素质培养任务,并理解同一素质培养的先修课程和后继课程的要求,使同一素质的培养形成递进式体系,在培养体系中找准自己课程的定位和任务,使整个专业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达到预期效果。

最后,系统化研讨本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课程本身的技术特征,从而确立课程的思政目标。如果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是某一素质的入门培养,那么该课程的思政目标可以确立为相应素质的意识唤醒和思想认同;如果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是该素质的基础性训练,那么该课程的思政目标可以明确为相应素质的思维方式形成与内化;如果课程的思政目标为该素质的高级训练,那么该课程的思政目标可以明确为该素质的外化行动。此外,应根据课程的技术特征明确课程思政目标的培养角度。如对于“工业控制装备”这门课,课程思政目标之一为“通过 PLC 系统工程实践培养学生精益求精工匠精神”,通过 PLC 系统工程实践即为课程的技术特征,为教师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指明了方向。

(二)以引申转化融通课程思政内容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新工科课程思政内容,必须为二者之间架设桥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教师必须同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新工科课程的内容都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教师一般对课程内容比较熟悉,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教师认真学习领会,只有学懂悟透,才能将其转化为课程思政内容中的育人立意和价值导向。因此,教师必须多渠道强化政治理论学习,通过党员活动、慕课平台、学习强国平台等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专业教师队伍与思政教师队伍的共建活动,经常性地开展学习研讨,使教师能在学懂悟透的基础上设计课程思政内容。

第二,教师必须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对于我国新工科涉及的新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我国5G通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战略指导。教师在设计新工科课程思政内容时,要更多从新工科相关新技术发展需要的社会环境角度出发,分析新思想的核心内容对于产生创造性成果的支撑作用,从而建立二者之间融通的路径。

第三,教师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引导学生课程学习和实践的真理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大量科学真理,也是新工科课程思政引导大学生灵活应用的思想宝库。如“统筹兼顾”“共享发展”等都是新思想蕴含的新理念,“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也充分体现了各环节、要素、部分相互配合、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形成合力的科学道理。可以看出,新工科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跨界融合,在实施新工科项目中必须统筹兼顾各学科专业的不同需求。因此,教师在新工科课程的工程项目部分,可以把新思想的“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等设计为相应的课程思政内容。

(三)以多重维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

课程思政内容的供给,需要丰富的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可根据课程特点从以下几个维度挖掘思政资源:

其一,新工科课程思政的爱国主义教育维度。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工科课程的众多新技术都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自然,从爱国主义维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是新工科课程思政的首要任务。例如,在“工业控制网络”课程中,互联互通的工业网络

架构本身就符合新发展理念,因而可在讲授相关知识点的同时引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政内容。新工科技术革新非常快,经常会有相关领域实时进展的报道,教师可充分利用这些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挖掘课程思政资源。例如,在“通信技术”课程中,可借助紫金山实验室发布国际领先水平6G重大原创成果,这一振奋人心的时事热点,引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思政内容,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和科技报国热情。

其二,新工科课程思政的人生价值教育维度。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有机统一的。新工科课程属于前沿技术,对未来人类发展具有潜在的社会价值,可以从利用课程知识为人类发展作贡献的维度,给学生传递“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课程思政内容。例如,在“工业控制网络”课程中,可通过工业互联网将世界连成一个地球村,导入这种应用场景激励学生未来利用工业互联网技术科技报国,助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工科相关的项目显著地体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新工科人才需要培养其跨界融合、统筹协调能力,相关项目案例可作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课程思政资源。在课程实践环节可以设计跨学科协作的实践题目,如某生产过程的智能制造设计,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将个人价值寓于社会价值之中。

其三,新工科课程思政的理想信念教育维度。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够昭示奋斗目标,提供前进动力,提升精神境界。大学生只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激发起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发奋学习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现今的中国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每一项新技术的重大进展背后,都有一批科技工作者发扬崇高的理想信念,克服重重困难攻坚克难,课程思政可以充分挖掘这些资源。比如,前文提到的紫金山实验室6G技术的重大突破,研发团队在起步落后其他国家2-3年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国际领先的重大成果。教学中可用这种励志故事启发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追求崇高信念,掌握建设祖国和服务人民的本领。

其四,新工科课程思政的伦理道德维度。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于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当前,道德的发展和进步已经成为了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新工科相关的技术很多是新生事物,可以用来为人类发

展做贡献,也可能被利用祸害人类,教学中可补充反面案例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教导学生具有职业伦理,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课程思政资源。例如,一系列利用互联网技术的诈骗案例,金融领域P2P、大学生网贷等,利用这些职业伦理案例让学生感受其触目惊心的危害,从而树立恪守职业道德、提升个人品德的决心。

(四)以量身定制设计思政授课方式

为使课程思政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应针对课程思政资源的特点量身设计,选择最适合学生领会的方式开展教学。

在教学方法层面,需要教师充分研究,高屋建瓴地进行启发式引导,邀请领域内名家专家通过高站位、权威性的教学来启发学生。具体可以采用学生预先调研准备、课堂集体研讨的方式,让学生在查阅资料和充分讨论中体验课程技术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并在实践中遵从国家发展战略;也可采用教师传授关键细节的方式,或观看纪录片、故事片等方式渲染气氛打动学生;还可采用交流互动的方式,先让学生发表看法充分互动,最后教师总结引导到相应的思政目标;应用案例类多学科协作的课程思政资源,需要教师站在项目负责人的角度讲解各学科在其中的作用以及交叉融合点,分析统筹兼顾总体协调的意义;设计作业类的可以安排团队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亲身感悟不同分工的

作用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在新工科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中,应根据专业思政目标总体布局确定合适的课程思政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设计课程思政内容来支撑课程思政目标,挖掘大量的课程思政资源来支撑课程思政内容,再通过恰当的课程思政授课方式让学生有切身感悟,内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自觉行动,经过各环节的精心设计和教学实践,必然能够达到预期润心铸魂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吴岩.勇立潮头,赋能未来——以新工科建设领跑高等教育变革[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2):1-5.
- [2]林健.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通用标准研制[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0,(3):5-16.
- [3]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2020-05-28)[2020-06-01].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4]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6.
- [5]周端明,沈燕培.习近平科技创新重要论述指引新工科建设的方向[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4):1-7.

作者单位:黄锁明 南京工业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
李丽娟 南京工业大学电气工程与控制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邮编 211810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IPTTIAC Teaching in New Engineering

HUANG Suo-ming¹, LI Li-juan²

(1. Teacher Work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Scienc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arry out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IPTTIAC) in new engineering to cultivate new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At present, there exist problems in IPTTIAC teaching in new engineering, such as insufficient focus on the objectives of IPTTIAC, insufficient accuracy in the selection of the elements of IPTTIAC, insufficient supply of the resources for IPTTIAC, and insufficient reform in teaching methods for IPTTIAC. In IPTTIAC teaching,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objectives of IPTTIAC with the overall thinking, transform and integrate the contents of IPTTIAC with extension, exploit the resources of IPTTIAC with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design the ideological & political teaching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new engineering; IPTTIAC; objectives of IPTTIAC; contents of IPTTIAC; resources of IPTTIAC; teaching methods

问题与策略: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研究*

■梁炳辉¹,邓齐勇²,廖克敏³

摘要:当前,我国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在遴选流程、指导培养、队伍结构、师德师风、考核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应建立科学全面的选培制度,完善多元有效的指导监督机制,构建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落实规范明晰的德行机制,制定量化公平的考评体系。

关键词: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选培制度;指导培养;队伍结构;师德师风;考核制度

中图分类号:G6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43-05

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研究生导师队伍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等文件的印发,进一步强调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战略意义。现阶段,我国部分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在人才遴选、培训管理、指培机制、人才队伍、师德师风、考评体系等方面依旧存在着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持续推进研究生导师队伍的遴选、培养、管理、激励等体系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从而促进研究生导师队伍与研究生培养的双向提质。

一、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生导师选培流程问题

第一,研究生导师遴选自主权较大。我国1999年开始实行学位授予单位自行遴选,研究生导师的遴选权利就放在了院校一级,到现在为止形成的具有行政化色彩和事实终身制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普遍存在于我国高校内部^[1]。此外,部分高校在遴选研究生导师时针对学历、知识、能力、学生数量等维度的规定不够具体、细化,片面地追求导师数量,降低遴选标准,使

得研究生导师队伍提质难度加大。第二,研究生导师培训流程、方案规范程度亟需提升。规范的流程、细致的培训方案对研究生导师参与培训具有正向作用。一旦培训流程、方案落实不到位、不细致,便会导致研究生导师培训效果大打折扣,致使研究生导师无法胜任招生规模持续增长和培养类型多样化的新形势、新要求。

(二)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问题

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能力的高低决定了研究生学习成效和后续发展。目前,我国部分高校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三点:一是青年研究生导师缺乏指导培养经验。许多高校研究生导师以青年教师居多,其自身在研究生指导培养上欠缺经验,对课题申报、论文撰写、论文修改、毕业论文选题等方面存在着指导方向不明确、方法不恰当、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同时,由于研究生导师性格特点存在差异,加之缺乏对学生深层次的了解,经常采取以“我”为中心的指导风格,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导效果的提升。二是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方式两极化。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方式两极化主要指“压力式培养”和“放养式培养”两个极端层面。“压力式培养”即研究生导师对学生在学习、科

* 本文系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于三螺旋理论的地方高校‘双创’教育共同体构建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2022JGA2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1.梁炳辉(1981-),男,河南驻马店人,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邓齐勇(1995-),男,安徽芜湖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3.廖克敏(1982-),女,湖北潜江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的学院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美学研究。

研安排上过于繁重,造成学生缺少自主学习和生活时间。“放养式培养”即部分导师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和科研不干涉、不关心,给予学生学习、科研自主权,对学生学习、科研任务缺乏指导、管理和关心。三是研究生导师自身教学和科研压力大,时间和质量难以保证。部分研究生导师除了承担普通教师工作外,还身兼数职,工作超负荷已成为事实^[2],这亦是导致部分高校研究生培养处于“放养”状态的原因之一。

(三)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问题

第一,师生比失衡。随着近年来研究生扩招,研究生数量激增,高素质、高水平、高能力研究生导师数量增长相对缓慢,造成部分高校“三高”导师少、学生多,生均资源不匹的结构性矛盾,对研究生培养质量产生不小阻碍。第二,年龄结构断层。当前,我国老中青导师梯队分布不够合理,大都以40-60岁导师为主,30-40岁年富力强、才华横溢、最具创造力年龄段的优秀导师青黄不接,不利于研究生导师队伍创造力的发挥。第三,学历水平偏低。学历水平高低是衡量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美国一流大学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一般都在90%以上,而我国高校研究生导师学历层次以硕士学历为主,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相对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部分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学历水平亟需提高。

(四)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问题

师德师风建设关系着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也决定着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3]。近年来,师德失范的负面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问题不容小觑。第一,高校师德师风缺乏系统性建设。我国研究生教育相比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更加偏向研究生导师的职称、学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考核,在师德师风上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将系统性、持续性、突破性的师德师风建设贯彻落实到研究生导师遴选、培训、评价的全过程。第二,研究生导师师德师风监管难度大。研究生导师对研究生评奖评优、学习资源、就业升学等具有较大干涉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研究生导师监管工作难度增加。

(五)研究生导师考评管理问题

现阶段研究生导师考评管理体系的特异性不足,研究生导师指导方式、态度、能力、效果等量化评估难度大^[4]。高校考核体系不够完善、考核方案不够系统、考评环境不够透明,以导师学术科研成果作为核心考

评标准的高校不在少数,存在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及导师个人师德师风考核比重少等问题,使得个别导师师德意识薄弱、责权意识不强、学术失信等问题时有发生。同时,我国各高校暂未形成公认、系统、科学的研究生导师评价标准和评估模型,各地对研究生导师的考评管理标准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研究生导师队伍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二、高校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策略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其建设成效关乎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为此,要按需而选、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进行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指培机制、人才队伍、德行机制以及考评体系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治学严谨、德才兼备、业务精湛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一)建立科学全面的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

1. 制定研究生导师遴选办法

第一,各高校研究生院要积极对现有研究生导师数量、年龄、学历、职称、德行等进行充分调研、记录、分析,基于学校和专业学科发展战略需求,制定精准细致的研究生导师遴选计划和标准。第二,立足高校和学科“双一流”发展实际需要,在确保遴选质量前提下,从学科大局出发,以“双一流”战略眼光来严格遴选与学科发展相符合的高质量人才。第三,高校要从战略层面组织新研究生导师遴选评定会议,坚守研究生导师遴选底线,坚决拒绝“无德导师”进入研究生导师队伍。第四,要着力解决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等失衡问题,通过招聘、引进、培训等举措,积极打造老中青导师梯队分布合理、学科背景交叉有序的复合型研究生导师队伍。第五,根据学位类型、课程设置、培养目标遴选导师时,要改变单一的遴选标准,依照实际情况有所偏重^[5],确保研究生导师队伍遴选机制的合理性。

2. 完善研究生导师培训体系

目前,完善研究生导师队伍培训体系对于提高老中青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水平尤为重要。第一,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应当着力从高校侧、导师侧、学生侧出发,制定满足高校学科需求、导师职业需求、学生学业需求的培训方案,做到三方共参、共培、共赢。第二,科学、规范、持续的培训体系是提升研究生导师培训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部分高校存在培训流程随意等问题,影响培训效果的提升,需要着力构建规范、有序、系统、持续的培训流程和考核机制,极力将培训效果、考

核等级与导师招生资格、数量等挂钩,促使研究生导师在意识上真正认识到研究生导师岗位职责和义务,提升导师有序参与培训的积极性。第三,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职级、不同类别的研究生导师,采取动态分层、多级协调的培训方式,切忌局限于理论培训和思想灌输,要努力拓宽和丰富研究生导师培训渠道、培训内容,在学历提升、科研能力及新媒体应用技能等方面制定阶段性、持续性和差异性培训方案。

(二)完善多元有效的研究生导师指培机制

1.构建研究生导师指导培养方案

第一,研究生导师要依据研究生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短期、中期、长期的培养计划与方案,努力做到学生培养方案差异化,提升学生科研竞争素养。第二,研究生导师要积极提供自身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源,为研究生学术提供资源后盾,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术会议,提升自身学术与科研素养。第三,要为研究生的学术发展提供指引与规范,引导学生潜心问道、热衷学术,规范培养方案和指导方式^[6]。第四,高校与二级学院要丰富课程设置,合理设定课程、毕业开题、毕业答辩等时间,定期举办科研方法、学术规范指导,鼓励自主参与、举办学术科研会议,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综合实力,努力实现课程设置科学化、培养目标合理化、培养方案体系化。此外,研究生导师自身要践行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理念,强化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公民道德意识,严格约束自身的行为^[7],强化导师的“指导”功能,真正建设成为乐于、勤于、善于指导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2.完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制度

积极完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制度是规范导师队伍指导行为的重要一环,是加强导师队伍顶层设计的突破之举。第一,要发挥社会、学校、学院、学生等多主体功能,将研究生导师日常指导方式、指导态度等纳入到导师师德考核评价之中。第二,要强化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指导理念和指导方式的宣传、督导和检查工作,制定全流程化的导师指导规范手册、指导监督细则、指导检查方案和流程,确保导师指导行为管理的检查监督机制的贯彻落实。要在研究生指导过程中核实导师有无指导、指导是否到位、论文是否达到毕业要求^[8],对导师“过分作为”“过分不作为”以及失德行为等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增强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管理和检查监督机制的威慑力。第三,高校要强化研究生导师岗

位职责管理,针对研究生导师工作安排上要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科研工作、教学工作方面要制定与研究生导师职务相符合的任务量与考核指标,给予研究生导师足够的指导管理时间,从而促进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制度的完善。

(三)构建结构合理的研究生导师人才队伍

1.优化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

第一,研究生导师招聘和引进数量要基于合理的师生比、年龄段以及学历学科背景综合考虑,按需设岗,确保招聘和引进的研究生导师有利于优化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提高研究生导师队伍整体水平。第二,从学校及学科长期发展的需求出发,建立持久长效的多指标动态优化机制。当研究生导师数量、职级或者其它结构性指标发生变动时,多指标动态数据要及时精准地送到学校—学院—学科负责人手中,使其掌握和分析导师队伍结构性矛盾等数据,坚持“立足大局、前瞻引领、系统推进、结构合理”的队伍理念,制定实施针对性的优化方案。第三,对于国家急需专业或者学科基础差、师资水平弱的学科门类,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推动研究生导师人才结构和人才梯队建设,并以此为核心来不断增强学科实力和研究水平^[9]。

2.力促研究生导师队伍优化

高校要深刻认识组建复合型研究生导师团队对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重要价值。第一,要建立健全校内与校外跨学科导师任职交流制度,鼓励、引导、支持部分校内研究生导师前往校外兼任企业的职务,积极引进知名企业杰出人才担任校外研究生导师,促进校内外优秀人才的双向交流,努力促进校内校外导师资源形成合力。第二,要积极协调跨学科师资力量,打造研究生导师智库平台,着力完善复合型研究生导师引进、培训、融合等方案,优化复合型研究生导师合作环节,整合项目合作机会和资源。第三,要加强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经费支持,定期举办学科前沿交流、分享、融合会议,制定以共同领域为研究基础、以跨学科提升为目标的研究合作制度,从而为研究生导师队伍优化提供内外在支持。

(四)落实规范明晰的研究生导师师风机制

1.培植师德师风的任务指向

第一,必须要拓宽立德树人的实现路径,鼓励研究生导师将立德树人在组织建设中推进、落实在课程教学中、强化在科学研究中、体现在师德师风中、反馈在

日常生活中,要让导师真正认识到师德的本质内涵、重要意义、具体要求和实践方式,确保研究生导师关爱学生、热爱教育、热衷学术,崇尚科学、敬畏科学。第二,必须发挥舆论的强大功能,高校要守住教书育人的舆论阵地,积极弘扬高尚师德,选择、树立、宣传导师典范,在广大师生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并弘扬优秀导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讲好师德故事。但对于导师师德师风存在问题的案例,要客观、全面、公正地进行报道和批判,不能片面夸大、以偏概全地进行错误报道。

2. 设定师德建设的实践规范

第一,要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统一。研究生导师在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去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专业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行,不断强化教学与育人能力。第二,要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启蒙者、教育者和管理者,在对研究生进行教育管理时,要始终坚守岗位职责与使命,不忘职业操守,要将自己积极乐观、一丝不苟、严谨治学渗透到日常言行中,要注重“为人师表”与“率先垂范”,真正做到言传身教、知行统一。第三,要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研究生导师要保持终身学习,提升专业涵养,关心国家大事,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才能为学生指点迷津、引领人生方向。第四,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研究生导师要始终坚持按照“守底线”“讲诚信”“重实践”的学术规范开展学术研究,追求科学真理。只有坚持“四个统一”的实践规范,才能促使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由被动向高度自觉、高度自发和高度自为转变。

(五) 制定量化公平的研究生导师考评体系

1. 完善动态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

第一,学校、学院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导师考核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不断完善学生评价、自我评估、导师互评、科研评估、教学评估、师德评估等综合量化评估考核机制和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导师培养成效检验机制^[10]。考核工作事关考核主客体、考核目标、考核方法和考核指标体系等诸多要素,只有各个要素明确细致并充分发挥其功能作用,才能为研究生导师考核提供有效保障^[11]。第二,要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研究生评价委员会,强化季度、年度考核制度,确保动态评估机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断细化考核评估指标,将研究生导师的工作量与研究生导师的业绩相挂钩,强化

研究生导师的职责意识。第三,研究生导师考核评估存在的问题及考核结果要及时公示,确保公平和透明。例如,对于多次考核不达标的研究生导师,要建立起研究生导师预警与淘汰机制,当研究生导师相关考评指标接近警戒数值时,应及时向研究生导师推送预警信息动态。要将考核结果与招生资格相关联,着力打造一支创新、动态、健康的研究生导师队伍^[12]。

2. 健全公平合理的激励监督机制

随着“双一流”高校建设的深入推进,健全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对促进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尤为重要。第一,高校要深化研究生导师的绩效改革,要落实公平合理的导师激励机制,提供多种研究生导师奖励渠道,对在研究生培养、研究生教学、专业技能、学术科研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和成就的研究生导师,加大奖励力度,丰富奖励形式。要积极落实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唯项目的评价指导思想,努力构建系统、全面、公平、合理的奖评体系。第二,对于积极履行职责、主动奉献的导师,要在津贴补助等物质激励的基础上,加强精神层面等方面的奖励^[13]。第三,各项激励机制与方案要以公平合理为底线,拒绝“近亲繁殖”“行政干预”等破坏激励公平的现象发生,要保证评选、公示、监督、举报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营造公平合理的环境,促使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走上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

现阶段,各高校应立足实际,坚持开放包容的思想,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努力解决研究生导师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坚持以思想引领为主线,以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强化导师职责意识,树立服务思想,尊重个性特质发展,全方面、多主体、持续性推进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实现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可持续、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郭馨靓.我国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9.
- [2]付梦芸.研究生导师压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研究生院高校的实证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5,13(3):34-40.
- [3]刘志.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需正确处理三大关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9,(1):51-52.
- [4]陈著.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绩效考评体系问题与优化——以中国科学院为例[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2):214-222.

- [5]于立娟.浅谈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5,(18):62-64.
- [6]刘宏伟,王新影,李雪梅.“四个统一”: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价值遵循[J].现代教育管理,2020,(7):68-74.
- [7]钱嫦萍,胡博成.新时代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的时代内涵、现实难题和实现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19,(9):107-111.
- [8]姚琳琳.研究生导师的权利诉求及其规范的制定[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9,35(3):47-56.
- [9]李明忠,褚照锋,邵攀等.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群体特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7):33-44.
- [10]侯士兵,叶定剑,吕江英等.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首要责任落实路径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3):141-144.
- [11]曹洪军,王娜.促进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考评工作的四维维度[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33(1):139-143.
- [12]时花玲.问题与对策: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30(3):32-34.
- [13]姚琳琳.研究生导师职责的探讨[J].高教探索,2018,(2):84-90.

作者单位:梁炳辉 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柳州 邮编 545006;邓齐勇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 邮编 541004;廖克敏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的学院,广西桂林 邮编 541004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Supervisor Team in Universities

LIANG Bing-hui¹, DENG Qi-yong², LIAO Ke-min³

(1.College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College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3.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guidance and training, team structure, teacher ethics, 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graduate-supervisor team in China's univers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supervisor team in universities, we shoul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mprove a diversified and effective guidance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build a reasonably structured talent team, implement a standardized and clear moral mechanism, and develop a quantitative and fair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universities; graduate supervisor; team building; selection system; guidance and training; team structure; teacher ethics; assessment system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困局及破解

■王安琪,汤金树

摘要:当前,数字化转型赋予信息素养更丰富的时代内涵,呼吁教师适应课程教学方式快速迭代,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呈现数字化发展态势。然而,在高校外语教师素养迭代提升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数字化支持机制不完善、信息素养标准体系不健全、信息素养培训体系待完善、对外语及相关学科专业支撑度不高等困境。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应该持续优化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支持机制,完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体系标准,提升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培训水平,提升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专业的支撑度。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标准体系;培训体系;专业支撑

中图分类号:G6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48-04

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指出,要“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推动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从提升师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全面提升其信息素养转变”^[1]。从高等教育教学现状来看,教师信息素养难以及时随信息化技术更新而实现迭代式更新提升,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高校外语教师肩负着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其信息素养的迭代提升决定着其外语信息化水平,决定着高校学生外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化视野的全面提升,进而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一、数字化转型对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新要求

(一)数字化转型赋予信息素养更丰富的时代内涵

“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 1974 年,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Paul Zurkowski 提出。他认为,信息素养是指人们经过训练,学习如何在工作中使用信息工具和获取主要资源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兴起,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快速

发展,对劳动力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与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可以说,互联网催生了数字化思维、分布式认知、虚拟空间中的知识传播与人际交往方式,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教师信息素养的内涵也被赋予信息时代的烙印。

(二)数字化转型呼吁教师适应课程教学方式快速迭代

近十年来,以互联网为依托的 MOOC、SPOC、智慧教学系统与工具蓬勃发展,课程内容、课程载体、课程组织与实施等课程基本要素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课程形态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迭代与巨变。与此同时,微课教学、网络直播教学、翻转课堂等新教学模式应运而生,为教与学带来更多的选择与可能,也将对传统教学模式带来颠覆性冲击。另外,上述这些变化还将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而深刻迭变。这必然对教师信息素养的迭代提升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 2008 年、2011 年、2018 年发布事关全球教师信息素养发展相关框架或标准,充分体现出国际组织对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远见与理念。其中,在《教师信息通讯技术能力框架(第三版)》中提出,教师应具备 18 项信息技术能力,

作者简介:王安琪(1990-),女,安徽池州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汤金树(1964-),女,湖北黄冈人,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语言文化、日语教学研究。

涵盖技术应用的三个发展层次(知识获取、知识深化、知识创造)和教师工作的六个实践维度(理解教育政策中的信息技术、课程与评估、教学法、数字技能应用、组织与管理、教师专业学习)^[3]。显然,不断迭代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的时代要求。

(三)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呈现数字化发展态势

在我国外语教育领域,有学者认为,大学英语教师的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信息能力可细分为七种信息技术运用能力:获取、评价、处理、管理、整合、交流和研究能力^[4]。一些学者界定了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五个维度,分别是信息化教学操作、信息化能力、信息化意识、信息化行为、学生信息化意识和行为判断^[5]。可见,已有研究多是从静态角度探究了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基本构成。然而,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持续快速迭代的过程,必然对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有着持续迭代提升的高要求与新要求。对高校外语教师而言,在熟练掌握外语学科知识和教学能力的基础上,要主动适应信息素养内涵的多元化和高阶性发展要求,形成敏锐的信息意识和信息思维,养成信息知识能力迭代提升的习惯,改进和创新信息化数字化外语教学,强化信息伦理意识,把握好信息资源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逐步实现低阶素养向高阶素养的迭代转换。

二、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面临的新困境

从大学外语教育教学的一线实践来看,在数字化快速转型的技术背景下,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随现代信息技术快速更新迭代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

(一)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数字化支持机制有待完善

从大学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支持机制来看,还存在如下问题:其一,理念认识引领不到位。许多高校仍将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定位于外语教育教学的辅助工具,课程教学中技术应用呈表演性、随意性特征,尚未形成总体战略上的细化谋划,数字化资源存在着重复建设和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其二,投入保障不到位。相较于少数一流高校,大多数地方院校由于院校类别和所在地区的不同,外语教育信息化设施和资源建设情况参差不齐^[5],支持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保障机制也存在很大差异性。其三,数字化课程建

设规划不甚合理。如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中,语言技能类和文学文化类课程占比较高,而专门用途外语、翻译、语言学和非通用语种课程门数有限,且特色化的外语教学的数字资源开发不力,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外语教师投身信息化教学的能动性。

(二)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外语教师信息素养体系标准有待完善

国内有一些主要针对中小学教师、师范生的信息素养与能力体系标准,而针对高校教师尤其外语教师专门化的信息素养体系标准还比较缺乏,总结概括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性问题:一是现有的信息素养体系标准,缺乏针对高校外语教师群体的信息素养体系标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中虽有提到,信息素养是高校外语教师能力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但缺乏可操作性的体系标准要求,大多数高校以普适性标准来对待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发展,而与外语学科特点、外语教师工作结合不够,难以满足高校外语教师发展的实际需求。二是既有国内普适性的教师信息素养标准制定和理论探讨,以借鉴相关国际框架和标准为主,与本土化推进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发展规划及其对教师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契合度不高,难以很好地落实、落地,多数流于文件形式层面的存在。三是可持续优化改进不力。从信息素养更迭的国际惯例来看,国际教师信息素养标准平均每隔5年更新一次,而国内体系标准更新周期过长,与信息技术的飞速更迭发展不同步、难协同,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难以适应快速的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与新要求。

(三)适应数字化转型的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训体系有待完善

首先,既有信息素养培训缺乏外语学科的针对性。各类高校信息技术应用培训大多是面向全学科教师开展的,鲜有针对外语教师专业信息素养培训。从调研来看,外语教师已熟练掌握日常办公软件、音视频编辑软件、即时通讯软件等通用性教学工具,但对外语学习应用、协同写作平台、语料库等外语教学信息化手段应用不普遍且水平不高。其次,既有培训中缺乏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培训更多侧重于静态信息知识与信息能力培养,而对信息技术融入外语教学的能力素养训练重视不够,融合深度也不够。目前,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两张皮”的现象仍普遍存在,部分外语教师信息化技术使用与内容方法不匹配,技术通常用于

教师讲授、学生练习和自主学习,而课堂互动、学习评价和教师反馈应用较少,信息技术元素与外语教学全过程、各环节的融合尚未系统实现。再次,培训重理论轻实践,多以集中培训和网络研修为主,实践应用机会少,且外语教师以语言和文学专业背景为主,信息素养基础薄弱,信息技术操作能力差,畏难情绪大,不利于知识的内化与理解,更遑论应用信息技术知识创造性地开展高水平的外语信息化教学。

(四)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外语学科专业发展支撑度不高

相较于对文学、语言学、翻译学学科知识掌握深度而言,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外语学科专业的支撑作用还没有充分凸显出来。由于高校外语教师对信息素养的学科专业支撑作用认识不到位,信息技术迭代更新研习的意识相对淡薄,大多数教师不了解外语学科专业资源获取途径,不善于利用网络拓展学习空间、与专家和同行建立联系,长期局限于传统的外语教科书和校本教材中,而不能利用开放式、交互式、国际化的网络平台与资源引入新的外语教育教学资源和科研资源。也就是说,信息素养不足的问题,必然制约着高校外语教师在教学素养、学科素养、科研素养等方面的发展,跟不上国际国内的学术前沿,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教学发展新趋势。尤其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仅要强调教师个人自主学习,还要重视基于网络交互式的虚拟共同体学习。从国家首批批准立项的虚拟教研室来看,基于网络化、数字化教与学的交流正在成为大学教学新趋势,但许多高校对基于网络化数字化的外语教师共同体建设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亟待加强。

三、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新路径

对标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新趋势,精准分析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着眼高校外语教育发展新阶段对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新要求,从四方面提出持续优化的新路径。

(一)持续优化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支持机制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应深刻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与外语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必要性,持续优化外语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可持续发展规划,从硬件环境、软件环境和课程资源等多方面入手优化大学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机制。一方面,要积极优化有利于外语教育信息化的硬件与软件环境,建设数字化语音教室,建设计算机辅助翻译实验室、外语

综合技能实训室、虚拟仿真语言综合实验室等外语类专用教室,大力度引入如 WE Learn 随行课堂、MyET 外语听说训练平台、iTEST 智能测试云平台网络教学与自主学习系统、训练与测试系统等数字化学习平台,为师生迭代提升信息化素养提供数字化与智慧化平台支撑。另一方面,要加大外语课程资源数字化建设,充分利用好新上线的国家级智慧教育平台,以及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U 校园智慧教学云平台等优质的外语数字化课程资源,鼓励教师立足线上线下外语校本课程教学的创新实践,使更多高校外语教师在实践中持续迭代提升信息化素养。

(二)持续完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体系标准

持续完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体系标准,对整体提升高校外语教师队伍的信息素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要以迭代的思维理念、宽阔的国际视野,借鉴国际国内通用的教师信息素养、信息技术能力、数字胜任力等标准,立足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由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细化优化制定适应高校外语教师的通用型信息素养与能力标准,并确定适应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创新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体系标准的迭代优化机制。另一方面,在形成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体系标准基础上,按照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标准体系,强化对外语教师的常态化评价,以其作为高校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重要参考,以此激励和引导高校外语教师持续提升信息素养水平,积极投身外语教育数字化与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高校外语教育教学水平。

(三)持续提升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训水平

专业化培训是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迭代提升的关键抓手。一方面,高校要根据通用型的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标准与能力要求,瞄准数字化转型实际,立足高校外语教育教学的实际,细化制定本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培训计划,实时根据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实际需求,坚持系统性与专题式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及时组织外语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的培训,并以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TPA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6]作为培训突破口,带动教师角色转型^[7],促进高校外语教师信息技术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除集中培训和网络研修外,还要鼓励通过实践应用方式,激发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的主体能动作用。如通过举办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大赛,将教学软件开发、微课制作、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

例、信息化教学课程案例等纳入比赛范畴。同时将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与国际化信息科技企业、国际化外语教育培训企业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优化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的最新应用场景,增强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培养的前瞻性。

(四)持续提升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专业的支撑度

高校要不断强化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对学科专业的支撑作用。一是强化以信息技术迭代更新而不断提升信息素养的意识。积极拓宽外语教师学科专业资源获取途径,培养主动利用网络拓展学习空间、与专家和同行建立联系的意识,打破外语教学囿于传统教科书的桎梏,积极引导高校外语教师利用开放式、交互式和国际化的数字化网络平台,提升获取新的外语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的能力。二是通过迭代提升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拓宽国际视野。要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高校外语教师利用各类外文文献数据库的能力,提升追踪外语学科最新研究信息的能力,提升外语教师掌握国际化统计软件与方法的能力,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对外语教育学科专业及相关学科的支撑度。三是通过助推高校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构建面向国内外高校外语教师的虚拟学习共同体,搭建开放共享的数字化外语教学科研交流平台,提升高校外语教师自身教

学科研水平,同时也发挥其对外联络“窗口”和“通道”的作用,进一步为提升相关学科的国际学术影响力提供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 [2]Zurkowski P G.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and Priorities [Z].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974.6.
- [3]UNESCO. UNESCO ICT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 (Version 3) [M]. Paris: UNESCO, 2018.21-25.
- [4]秦美娟,何广铨. 大学英语教师信息素养内涵探讨[J]. 外语界,2009,(5):18-25+41.
- [5]方秀才,陈坚林. 中国高校外语教育信息化现状与规划建议[J]. 外语教学,2018,39(2):57-62.
- [6]Koehler M J, Mishra P. What i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J].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echnology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9, 9(1): 60-70.
- [7]刘凌燕. TPACK 框架下的教师角色转型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9,39(19):39-42.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 邮编 100083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WANG An-qi, TANG Jin-sh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Abstract: At presen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ndows information literacy with a richer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and requires teachers to adapt to the rapid iter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presents a digital development trend.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their literacy,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still face such problems as imperfect digital support mechanism, unsou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 system, imperfect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system, and poor support for foreign language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In the iterative improvement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we should continue to optimize the support mechanism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mprove the system standards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mprove the system standards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enhance the suppor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to their profession.

Key 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iterative promotion; standard system; training system; professional support

辩论式教学法的情境创设优势与设计原则*

——以高校说理写作课程为例

■高 策¹,毛清芸¹,谭胜蓝²

摘要:辩论式教学法历史悠久且应用广泛,近年来被引入高校通识说理写作课程。新兴的教学实践为研究这一传统教学方法提供了新视角。说理写作课堂教学目标的抽象性和综合性,突显出辩论式教学法创设复合性对话情境的教学优势:通过构建表达者与反对者的“对抗性情境”、表达者与读者的“说服性情境”以及兼备对抗和说服的“复合性情境”,有助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读者意识等说理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在教学实施中教师应重视如下设计原则:保障对立双方对话的充分性,增强辩论场景的真实性,把握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平衡。

关键词:高校;辩论式教学法;说理写作课程;情境创设;对抗情境;说服性情境;复合性情境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52-05

“辩论式教学法”通过把辩论活动引入教学过程,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该教学法历史悠久,并在各阶段、各类型课程中得以广泛应用。近年来,辩论式教学法进一步拓展了其应用范围,成为高校说理写作教学的重要方式。新兴的教学实践,为重新审视这一传统教学法提供了宝贵视角。本研究以辩论式教学法在高校说理写作课程的应用为例,分析其在情境创设方面的教学优势,进而提出在教学实践中的情境设计原则。

一、概念界定

(一)辩论式教学法

辩论式教学法,是将辩论活动转化、应用于课堂教学场域的教学法。“辩论”是一种持对立立场的各方,通过论证、反驳等方式,争取决策方认同的活动。在社会实践中,辩论是“有效的合理决策方法”^[1],如总统辩论、法院辩论、议会辩论等。在课程中,辩论式教学法的具体形式为: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设计辩论题目,组织学

生支持针锋相对的不同立场,在课堂上开展辩论比赛,包括赛前准备与赛后讲解等环节。

该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倡导自主、充分地参与其中,引导同学之间彼此写作、充分互动,探究具有思辨性的题目。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国战国时期的孟子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2],并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应用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历史、英语等学科,也被引入高等教育阶段的思政课以及公共管理、物理、医学等诸多专业课程。

(二)高校说理写作课程

“说理写作”(expositional writing)旨在通过文字表达,提出并论证作者主张、阐述事物道理,进而达到说服读者的目的。说理写作水平的高低,并非只关乎文字书写和语言表达,更与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搜集整合信息等综合素质密切相关,也是作者独立思考、理解世界、形成自身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由此,说理写

* 本文系清华大学写作中心教改二期项目“辩论在写作与沟通课程中的应用”(项目编号:xzjg2021-1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1.高 策(1991-),男,河北石家庄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1.毛清芸(1991-),女,重庆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2.谭胜蓝(1995-),女,湖南怀化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青少年心理发展研究。

作课程逐渐成为高校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诸多高校皆有此传统,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写作项目(Princeton Writing Program),立意为塑造“可迁移的”阅读、分析、论证、写作、评议等综合性研究能力^[3];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亦有类似课程。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借鉴国外通识教育经验,中国高校在近年探索并开设说理写作课程。2018年,清华大学提出建设面向全体本科学生的“写作与沟通”课程(以下简称“写作课”)。“写作”即说理写作,该课程“旨在向学生传授多元主题写作沟通的相关知识,锻炼学生的写作与沟通能力,最终打通多元学科间的基础逻辑,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逻辑思维”^[4]。清华写作课在国内说理写作课程中起步较早、规模较大,故本文将其作为代表性案例进行探究。

二、辩论式教学法的情境创设优势

辩论式教学法在说理写作课程中的应用,集中展现了其在“情境创设”方面的突出优势。该教学法能够创设与说理写作同构的复合性对话情境,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辩论式教学法创设了正方、反方、评审的三方对话情境。其中,正反双方分别秉持不同立场,针锋相对,处于“对抗性情境”;双方皆须努力说服评审,获得其认可,构成“说服性情境”;两种情境同时发生、彼此交融,组成“复合性情境”。同样,说理写作也处于表达者、反对者与读者的三方对话情境。说理写作要求的写作思维,核心体现为“批判性思维”和“读者意识”,亦即表达者不但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还要回应可能的反对意见(反对者),同时照顾到读者的接受情况。

(一)创设对抗性情境,有效训练批判性思维

辩论式教学法构建了正反双方针锋相对的“对抗性情境”。教学活动中,学生被分为不同小组,分别支持同一辩论题目的不同立场。辩论过程中,每组学生不但要有理有据地论证自己的立场,还要回应对方的反驳,同时指出对方的论证缺失,在“对抗”中完成说理。

“批判性思维”是说理写作的核心素养之一。其含义复杂,有学者综合前人说法概括为“个体对产生知识的过程、理论、方法、背景、证据和评价知识的标准等正确与否,作出自我调节性判断的一种个性品质”^[5];美国哲学学者布鲁克·摩尔形象地描述称,“像思维教练一样对自己的思想展开批判”^[6]。在说理写作教学中,它也被归纳为“反对者意识”“留意相反观点”^[7]等说法,在阐述自己观点时,作者应时刻思考被反驳的可能、

并做出回应。

对抗性情境有助于突破教学难点,实现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有效训练。思维训练往往成为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尽管课程讲授了论证方法与技巧,学生在写作中仍常会陷入自身思维定势,难以发现文章论据、论证方面的缺失。而对抗性情境则会“迫使”学生反复考虑己方论证的缺失:在此情境中,己方论据是否充分、文献来源是否可靠、概念界定是否清晰、预设前提能否成立、逻辑是否严谨等都会面临当场质疑。这种被当场质疑的巨大压力,会促使学生在准备比赛时反复考虑可能遇到的反驳,在课堂辩论中努力做出有效回应,在辩论结束后仔细复盘,寻求更优论证。辩论式教学法创设的对抗性情境,将本应存在于作者思维中抽象的“反对者意识”转化为实际情境中可感知的对方同学,将本应由作者自己完成的“思想批判”具象化为来自对方的现场反驳,从而提升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效果。

(二)创设说服性情境,直观强化读者意识

辩论式教学法构建了正反双方争取评审认可的“说服性情境”。辩论活动中各方互相反驳,其目的不在于“打倒对手”,而在于争取决策者或者评审的认同。在社会实践中,民众、法官、陪审团等构成决策者;而在教学中,则由教师安排判定比赛胜负的评审。在此情境中,表达的说服效果至关重要。

“读者意识”指作者在写作中对读者“信息需要”的关注,具体来说,意味着“作者设定读者对象,预测读者的需要与期待,根据写作目的来选择语义、安排结构、建构文章,从而引导读者能深层次地理解与认可作者的观点并产生共鸣”^[8],是说理写作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说服性情境有助于突破教学难点,实现对学生读者意识的直观强化。与批判性思维一样,读者意识的培养也极为困难,课程中教师反复强调,落实到实际写作中却收效甚微。说服性情境则有助于提升表达者对读者的关注意识:在评审点评环节,学生可具体感知表达者“自认为”传达的内容与评审“实际接收”到的内容之间存在差异;这样的差异真切地展现了读者视角与作者视角的区别,有助于学生发现自己在语言组织、逻辑脉络、表达结构等方面的缺失。辩论式教学法创设的说服性情境,将本应存在于作者思维中抽象的“读者意识”,转化为实际情境直观可感的“评审”,实现学生读者意识的直观强化。

(三)创设复合性情境,促进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

辩论式教学法不但构建了上述两种对话情境,更重要的是将二者置于同时发生的场域,构建了说服性与对抗性兼备的“复合性情境”。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点,可以将辩论式教学法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演讲”训练也可以让学生关注到读者的反应,但是该情境缺乏反对者的声音;驳论文的撰写,也可以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但“读者”并未直观存在。在辩论式教学法构建的复合性情境中,表达者既要回应反对者意见、维护己方观点,又要注意评审感受与说服效力,肩负复合性任务。

兼备对抗与说服的复合性情境,有助于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在复合性情境中,表达者须同时兼顾反对意见和读者感受,于是表达过程中常会暴露顾此失彼的问题:表达者如果只关注自己内容的传达与读者的接收,则可能会无法回应反对者的意见;而如果只顾着回应反对意见,则可能无法让读者更好地接受己方观点。这样的“两难状况”生动地创设了类似于写作过程中多种思维共同运作的情境,有助于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

三、辩论式教学法的情境设计原则

为了发挥辩论式教学法在情境创设方面的教学优势,需要寻求合理的情境设计原则。以下从对话充分性、场景真实性、说服与对抗的平衡三方面加以论述,通过辩论题目、比赛制度、角色设定和人员组成等具体设计进行阐明,并以高校说理写作课程中较有代表性的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课程的实践为案例。这里对清华写作课的特点稍作说明:其一,小班式教学,每个课堂容量约16人,便于教师灵活安排课堂组织形式、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其二,主题式写作,即每个课堂由教师按照某一特定写作主题进行设计和组织,主题涉及人类历史、社会生活、未来科技等多个领域。

(一)保障对话的充分性

辩论式教学法创设“对抗性情境”,学生需与持不同立场的“对手”进行针锋相对的发言,在“对抗”中完成说理。为了有效创设此种情境,实现对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在教学设计时应立足辩论题目和比赛制度两个维度。要努力促使对立双方充分对话;避免双方各说各话,或一方侃侃而谈、另一方无话可说的情况。

第一,辩论题目的拟定至关重要。为了让对立双方充分对话,辩论题目应做到具体、可辩且均衡。

一为“具体”,是指辩题宜聚焦某个具体的话题,避免空泛。这有助于双方拥有共通的知识背景,比赛时可以形成更有效的互动。如果题目过于宏大,可能正方所谈内容反方并不了解,反方所举案例正方并不知情,致使讨论无法聚焦。为了达成这一目的,题目不必拘泥于一句话的形式,可以增加更多对辩题的解释,形成“题解”,具象化讨论背景。举例来说,“从《聊斋》到《山海经》”主题写作课起初设置辩题为“21世纪华语神怪电影是否打破了性别成见”,辩论过程中一方所举电影另一方可能很陌生,于是出现双方各说各话的情况。经研讨、修改后,辩题具体化为“《捉妖记》的男女主人公设定是/否打破了性别成见”,并附上题解:“《捉妖记》中女主是一位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捉妖师,承担着保护者的责任,而男主角天荫不但温柔善良,还怀了身孕,是个被保护者。这样的设定是否打破了性别成见?”这样一来,双方皆在赛前研讨同一部电影,辩论中内容更为聚焦,交互性增强。

二为“可辩”,即增强不同立场的冲突性,使各方可以互相反驳。具体来说,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方面,避免纯粹事实判断类的题目。此类辩题或已有较为确定之结论,例如,“光是波动的还是粒子的”;或虽有争议,但难以通过双方辩论更加接近真相,而需要更多科学实验或文献资料,如“司马迁卒年问题”“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健康”等。另一方面,应避免双方各自成立、自说自话的情况。例如,“大航海时代”主题写作课拟探讨“要/不要拆除位于芝加哥市中心公园的哥伦布雕像”一题。在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反种族主义者看来,这样的雕像意味着一种以旧南部奴隶主利益为核心的历史叙事,应当被改写;而在其他当地居民看来,雕像则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属于他们的公共财产,不应拆除。学生如果代入不同立场,各有道理,很难构成观点的冲突,辩题不具可辩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精巧地设定思考问题的视角——一个必须要权衡各方利益的视角,由此可将题目修改为“2020年,如果你是芝加哥市长,要/不要拆除位于市中心公园的哥伦布雕像”。原本只需代表个别人群讲话的辩手,就需要站在市长的角度,权衡非裔美国人、反种族主义者及其他当地居民,做出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而形成充分对话。

三为“均衡”,即辩论双方应具有基本对等的论证义务,避免任何一方具有天然优势、轻松得证,而另一方难以论证,甚至无话可说。例如,“药”主题写作课计

划探讨带有未来色彩的话题——是否应该研发“长生不老药”。反对方核心的论证思路在于“长生不老药”导致的伦理、价值观念,然而如果支持方紧扣“研发”一词,提出“只做研发,未必推广”,则反对方的论点很难展开。后将辩题修改为“假如长生不老药已经研发成功,是否应该准许其推广使用”,使双方论证难度更为均衡,增强交互,也更有社会层面的思考价值。

第二,比赛制度即双方发言的规则,也相当程度地影响双方对话的充分性,设计时需明确包含彼此反驳、质疑和回应的环节。辩论比赛制度种类多样,如议会制、奥瑞刚式、华语国际大专辩论赛制等,但在教学中不必整体照搬某个制度,而可以根据情况灵活设计。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让对立双方充分交互,应有意识地安排各个环节的职责。例如,不同发言轮次可以分别承担起“论证己方观点”“反驳对方立论”“回应对方的质疑”等任务。这样可以在制度设计层面确保有效加强对话。

(二)增强场景的真实性

辩论式教学法通过创设情境实现教学目的,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沉浸在情境中,却成为教学的难点。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在情境创设时应该着力在角色设定和评审安排上下功夫,力求增强场景的真实性,从而加强学生的代入感。

其一,应为辩论各方设置具象而真实的角色。虽然“辩论”本就是社会生活中的真实场景,然而当被引入教学环节后,其真实性却大打折扣。因此,通过更为具象的角色设定,能让学习者更好地代入情境。例如,《西游记》主题的写作课,设置辩题“《论语》和《西游记》何者更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将儒学经典《论语》与文学名著《西游记》对比,以期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为增强情境创设的真实性,可以设置学生、家长、教师、学者等多元角色,令其分别支持不同立场;评审则设定为教育部官员或教材编订者。在此场景中,表达者带有自身知识与经验,辩论的决策则会切实影响社会生活。如此一来,学生不是“为了发言而发言”,而能够体验与真实生活更为接近的表达。

其二,建议邀请课堂外人员作为评审,构成课堂教师、学生以外的“第三视角”。如前所述,评审是辩论式教学法情境创设的关键,对学生“读者意识”的直观强化颇为重要。很多课程会直接由任课教师担任辩论评审,这当然也能起到效果,然而却有其局限性。若能邀请课堂师生以外的其他人员,则能构成超越“师生关

系”的第三视角,更有助于学生进入“说服力情境”,真正将评审视作要说服的“读者”。

(三)把握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平衡

在教学设计中,需要把握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平衡,否则,无法实现对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把握平衡的最大阻碍,恰恰来源于对辩论的认知误区。辩论常被误解为不同立场的双方各自论证己方观点、驳斥对方观点的活动。在这样的理解中,辩论似乎是一个仅关乎双方的活动,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构成元素——评审。由于这种认知误区,加之比赛竞技性的刺激,学习者参与辩论时常会过度沉浸在“对抗性情境”,忽视“说服力情境”。因此,应从以下三方面优化教学设计。

第一,通过前期讲授,破除学生对辩论的认知误区,强调辩论说服与对抗的双重性质。第二,突出说服力情境的重要性。例如,在场景布置时,可以用名牌、座位等突出评审位置;在环节设计中,可以增加评审点评的比重,请评审基于自身对辩论内容的接收和回顾双方的表现来说明评定理由。第三,通过赛制设计控制辩论的对抗强度。所谓“对抗强度”,取决于辩论中双方即时交互的程度,即时性、交互性越强,则对抗强度越高。如果赛制过度激烈,不但让学生忽视说服的目的,还可能导致学生难以输出高质量观点,限制比赛内容呈现。通常,辩论环节可划分为两类:“交锋”以质询、对辩、自由辩论为代表,双方交互发言,以问答形式展开,对抗性、即时性较高,对学生临场反应能力要求极高;“陈词”则为较长时段的个人陈述,对抗性、即时性较低。因此,赛制设计当以双方轮流陈词为主、交锋环节为辅,控制对抗强度。综合运用上述方式,能帮助教师把握说服力与对抗性的平衡。

基于高校说理写作课程中辩论式教学法的应用,可以看出此教学法在情境创设方面的教学优势:辩论式教学法创设与说理写作同构的、兼备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复合性对话情境,从而实现说理写作中批判性思维、读者意识等写作思维的综合培养。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提出在教学实施中的情境设计原则,即保障对立双方对话的充分性,增强辩论场景的真实性,以及把握对抗性与说服性的平衡。

然而,辩论式教学法意涵丰富,而高校说理写作课程在国内尚属探索阶段,故而本研究仍有较大拓展空间。例如,辩论比赛虽与说理写作有共通之处,但在结论可否调整、立场是否二元对立等方面仍有重要差异。

归纳这些差异,并据此灵活调整组织形式,不失为辩论式教学法的新探索。

参考文献:

- [1] 奥斯丁 J. 弗里莱 (Austin J. Freeley). 辩论与论辩 [M]. 李建强等译.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6.3.
- [2] 刘文光. 辩论式教学溯源及特点探析 [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8, (1): 125-126.
- [3] 陈乐. 写作研讨: 普林斯顿本科生的“前学术训练”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8, (17): 50-56+70.
- [4] 梅赐琪. 遵循三大规律的通识教育课程思政模式创新——以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课为例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 (3): 99-104.
- [5] 罗清旭. 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0, (4): 81-85.
- [6] 布鲁克·摩尔, 理查德·帕克. 批判性思维 [M]. 朱素梅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3.
- [7] 刘军强. 写作是门手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181-182.
- [8] 李莉文. 英语写作中的读者意识与思辨能力培养——基于教学行动研究的探讨 [J]. 中国外语, 2011, (3): 66-73.

作者单位: 高策, 毛清芸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北京 邮编 100084; 谭胜蓝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 美国 马塞诸塞州 邮编 02138

The Advantages and Design Principles of Situational Creation of Debate Teaching Method ——A Case Study of the Course of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Universities GAO Ce¹, MAO Qing-yun¹, TAN Sheng-lan²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Abstract: Debate teaching method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s widely used.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course of general reasoning and writing in universities. The emerging teaching practi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is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abstract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reasoning writing highlight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the debate teaching method in creating complex dialogue situations: helping to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such reasoning writing thinking as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aders' awareness by constructing the "confrontational situation" of the speaker and the opponent, the "persuasive situation" of the speaker and the reader, and the "complex situation" of both confrontation and persuasion.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uch design principles in teaching as ensuring the adequacy of dialogue between the opposite parties, enhancing the authenticity of debate scenes, and grasping the balance between confrontation and persuasion.

Key words: university; debate teaching method; reasoning writing course; situational creation; confrontational situation; persuasive situation; complex situation

社会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在医患沟通课程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葛文嘉¹,徐婉斐²,侯苗苗³,赵海潮⁴,常佩雯¹

摘要:在社会认知理论的框架下通过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对医患沟通课程进行改革,解决当前医学生医患沟通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个体、环境以及个体环境互动性差的问题。在某医科大学五年制临床专业课程中开设了医患沟通课程,采用 SEGUE 量表进行教师评价、医学生自评、互评,并通过 Mini-CEX 测评以及满意度调查评价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和培训效果,并对课程效果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在医患沟通课程中具有优越性,更好的还原了医患沟通情境,调动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自主探讨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关键词:社会认知理论;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医患沟通课程;学生学习主动性;自主探讨能力;临床思维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57-04

随着国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提出,对我国医学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提升医疗服务的人文关怀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将来医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因此,强化临床实践和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改革教学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化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1],使其具备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和有效的医患沟通技能,显得尤为重要。为解决当下医患沟通课程书面化教学的缺陷,在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的框架下,通过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对医患沟通课程进行改革,解决当前医学生医患沟通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个体、环境以及个体环境互动性差的问题。笔者在某医科大学五年制临床专业课程中开设了医患沟通课程,采用 SEGUE 量表进行教师评价、医学生自评、互评,并通过 Mini-CEX 测评以及满意度调查评价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和培训效果,并对课程效果进行评价,为将来教学模式的改革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取某医科大学 2015、2016 级五年制临床专业本科生 61 人。其中男生 29 人(47.5%),女生 32 人(52.5%)。

(二)研究方法

1.教学分组

针对“医患沟通”课程第二篇的教学分为两组。2015 级学生为传统教学组,共计 31 人,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理论授课为主要教学方法完成医患沟通课程。2016 级学生为活动教学组,共计 30 人,采用活动型教学模式,教师设计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遴选不同优秀教师扮演患者,将真实的临床场景进行高度还原。

活动型课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模拟临床课堂以及临床实践课堂。模拟临床课堂:部分主要由各教研室教师按照专业将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病情难易程度和所需技巧制定课程大纲,保证情境的独特性,由教学部

作者简介:1.葛文嘉(1976-),女,山东青岛人,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教学部副主任,主要从事医学教育研究;2.徐婉斐(1994-),女,山西运城人,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临床医学及人文社科调查研究;3.侯苗苗(1990-),女,山西运城人,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博士,主要从事临床疾病诊治和科学研究;4.赵海潮(1993-),男,山西大同人,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普外科医师、博士,主要从事临床模型构建研究;1.常佩雯(1991-),女,山西长治人,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教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按照不同专业递进关系编入“医患沟通”课程表;采取小班授课小组教学,每组控制在5-6人,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根据设置的不同活动议题,引导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社会性与协作性。临床实践课堂:能力评价体系同样强调情境与环境,在病房选取住院3天以上的患者,完成问病史、查体、交代病情及诊疗计划的内容。根据学生在医患沟通技能方面的表现,教师及其他医学生分别通过SEGUE量表对其进行评价,并记录SEGUE总分和各项评分。测评学生本人采用SEGUE量表进行自我评价,记录SEGUE总分和各项评分。患者对学生进行评价。

2. 出科时简易临床评估演练(Mini-Clinical examination Exercise, Mini-CEX)

测评方法 Mini-CEX 评分共7项临床科目(问诊技能、体检技能、人文关怀、临床判断、沟通技能、组织效能、整体临床胜任能力)和1项总体满意程度;每项满分9分(7-9分为优秀,4-6分为合格,1-3分为有待改进)。所有实习医学生进入科室的3天内进行首次Mini-CEX测评,之后每月上旬和下旬各进行一次Mini-CEX测评,期间每人共进行3次测评。评价背景是临床中的随机事件。参与Mini-CEX测评的教师共5人,均接受过Mini-CEX量表的培训,使评分标准尽量一致。每次考核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指定两位教师为学生评分,计算平均分为最终得分。

3. 满意度调查方法

调查采用纸质问卷及问卷星网络问卷,选取所有参与学生作为调查问卷对象,在该课程结课后进行不记名调查。调查答卷总数61人,回收问卷61份,问卷回收率100%。问卷的内容主要为单项选择题。调查内容分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能力培养、教学效果4个

方面共计9个指标,满意程度按照非常满意(5分)、满意(4分)、一般(3分)、不满意(2分)、非常不满意(1分)5个等级进行赋值评价,见表1。

表1 医患沟通课程满意度调查表

指标内容	满意度				
	5	4	3	2	1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5	4	3	2	1
教师有效利用时间	5	4	3	2	1
授课突出重点	5	4	3	2	1
合理课安排内容	5	4	3	2	1
注重师生互动,气氛良好	5	4	3	2	1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5	4	3	2	1
用已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	4	3	2	1
强化临床思维	5	4	3	2	1
在学习和工作上得到成长帮助	5	4	3	2	1

(三)数据统计

采用统计软件SPSS25.0进行统计学处理。经正态性检验,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bar{x} \pm 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分类数据采用例数(%)表示,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SEGUE量表总体情况

本研究共发放SEGUE量表488份,量表有效回收率为100%。教师对医学生SEGUE评分为 18.57 ± 2.04 vs 15.21 ± 2.11 分;医学生对自己SEGUE评分为 18.54 ± 2.08 vs 16.93 ± 2.11 分;医学生SEGUE量表互评分数为 18.73 ± 2.08 vs 15.97 ± 3.28 分,活动型教学组SEGUE量表总体评分高于传统教学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 < 0.0001$),见表2。

表2 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和学员互相评价的SEGUE量表评分($\bar{x} \pm s$)

SEGUE 量表	教师评价		医学生自我评价		医学生相互评价	
	传统教学组	活动型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活动型教学组	传统教学组	活动型教学组
准备	3.3±0.94	4.02±0.93*	3.60±0.99	3.90±0.97*	3.53±0.99	4.02±0.93*
信息收集	6.08±1.49	7.10±1.39*	6.48±1.50	7.10±1.41*	6.42±2.81	7.17±1.40*
信息给予	2.10±0.69	2.87±0.85*	2.47±1.30	2.81±0.86*	2.27±0.75	2.96±0.84*
理解病人	2.17±0.76	2.94±0.77*	2.66±0.87	3.00±0.77*	2.18±0.76	2.96±0.77*
结束问诊	1.55±0.56	1.61±0.49#	1.71±0.46	1.72±0.45	1.57±0.54	1.62±0.49#
总分	15.21±2.11	18.57±2.04*	16.93±2.44	18.54±2.08*	15.97±3.28	18.73±2.08*

注:* 活动型教学组 vs 传统教学组 $P < 0.0001$; # 活动型教学组 vs 传统教学组 $P < 0.05$ 。

(二)出科时简易临床评估演练(mini-clinical examination exercise, Mini-CEX)测评成绩比较

本研究在课程结束时进行 Mini-CEX 测评,测评结果显示活动型教学组在整体评价总体优于传统教学组。在人文关怀和技能沟通两项。活动型教学组均分分别为 9.4 ± 1.1 , 8.1 ± 0.9 , 明显好于传统教学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见表 3。

表 3 出科时 Mini-CEX 测评成绩比较($\bar{x} \pm s$)

项目	传统教学组 (n=31)	活动型教学组 (n=30)	t	P 值
医疗问诊	7.5±2.1	7.8±1.9	0.6419	0.9770
体格检查	7.6±1.3	7.8±1.2	0.4279	0.9787
人文关怀	8.1±1.2	9.4±1.1	2.782	0.0337
沟通技能	7.1±2.1	8.1±0.9	3.210	0.0087
组织效能	8.8±2.4	8.6±1.7	0.4279	0.9987
整体评价	8.3±1.1	9.1±1.1	2.712	0.0393

(三)满意度调查结果比较

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能力培养以及成长帮助进行满意度评分,根据回收调查表情况进行计算,核算总分进行比较,可发现活动型教学组学员满意度高于传统教学组,其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 < 0.001$),见表 4。

表 4 医患沟通课程满意度调查情况

	传统教学组 (n=31)	活动型教学组 (n=30)	t	P 值
综合评价	40.7±4.9	44.5±5.1	2.968	0.0043

三、讨论

社会认知理论是指讲学习和行为表现视为具有内在社会性的一组理论,更加强调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对其学习和行为表现的重要性。在不同的情境下带来的独特性会导致不同的学习结果和行为变化。社会认知理论认为环境与文化在主动学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活动型课堂的设定中更加注重与患者的交流,更是一种与环境文化的沟通。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是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目标,按照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在课堂上将学科知识以议题为纽带,通过若干个活动元串联的形式表现出来,着眼于课程内容的活动化和活动设计的内容化的一种教学模式。活动型课堂教学模式必须遵循向导作用,即培育学生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学生是整个课堂教学的主体和中心,且具有培养新时代学生核心素养的现实性。

本研究从课程整合,课程实施和课程效果评价全方位的对社会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活动型课堂进行评估。

一是课程整合的评价。医患沟通培训要与临床实际相结合,要与时俱进,根据实际需要开展课程。认知—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理论认为只有当医学生对医患沟通有充分的认知和认同,才会在日常诊疗行为中践行医患沟通技巧,真正提升医患沟通能力^[2]。从教学结果评价可以看到,与传统教学组相比,活动型教学组有效提高了学员医患沟通技巧和对医患沟通的热情,为开展医患沟通课程、制定医患沟通课程教学大纲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是课程实施的评价。活动型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设计课堂活动模拟真实的临床工作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增强学生临床工作处理能力。以往的研究发现,缩小班级规模能使教师迅速了解学生、给予针对性指导,提高教学效果^[3]。本研究中,以 30 人为单位进行小班授课,根据学生临床工作中的短板和欠缺,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在模拟培训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起引导作用,鼓励学生自由思考、发表自己的观点;课程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反馈自己在培训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点评其他学生,真正做到举一反三。课程的这一系列设计参考了美国匹兹堡大学重症医学情景模拟教学^[4]设计。活动型教学不仅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更激发了学生自主探索的精神,小班授课也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是课程结果的评价。通过研究发现本课题的教学模式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本研究的教学模式增强了学生复合型知识构建的水平,在医患沟通课程中显示优越性。研究发现,活动型教学在内科、外科、儿科医学生规范化培训教学中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5][7]}。在本研究中,活动型教学组在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和学员互相评价 3 个方面均较传统教学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充分肯定了活动型模拟教学在医患沟通课程中的重要性及可行性。

由上观之,社会认知理论指导下的活动型教学是医患沟通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医师,沟通为本。与患者沟通是一门学问,应重视医生对医患沟通技能的掌握,建立完善的医患沟通培训体系,保证医患双方沟通的有效性。通过不同类型的课堂活动,不仅提高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同时还加强了教学的实用性和实效性,使学生更快适应岗位角色,有助于建立规范、全面、先进、实用的医患沟通课程体系,也为医学人文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师资配备与培养、考核机制等提供了经验,为培养优秀的临床医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印发《关于实施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高[2012]6号)[EB/OL].(2012-05-07).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40/s7952/201205/t20120507_166951.html.
- [2]陆琳,何琳,陈玮等.《医患沟通》课程对提升医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效果研究[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2014,13(4):360-363.
- [3]邹扬,王道珍,芦开芳等.小班授课在医学生沟通能力培养中的应用[J].中华医学教育,2010,30(1):77-78+87.
- [4]赵慧颖,梁书静,姜冠潮等.美国匹兹堡大学重症医学情景模拟教学体系设置及其启示[J].中华医学教育,2019,39(12):

982-985.

- [5]王秀娟,王爱华,李晓丹等.医学生儿科医患沟通情景训练方案的设计与实践[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7,37(2):260-264.
- [6]贾方,李旻,孙茹蓉等.情景模拟教学在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9,11(31):77-79.
- [7]李亚伟,黄后宝,卓栋等.医患沟通情景模拟教学在泌尿外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应用的初步研究[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9,40(5):627-629.

作者单位:葛文嘉,常佩雯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教学部,山西太原 邮编 030032;徐婉斐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山西太原 邮编 030032;侯苗苗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神经内科,山西太原 邮编 030032;赵海潮 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普外科,山西太原 邮编 030032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in the Cours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GE Wen-jia¹, XU Wan-fei², HOU Miao-miao³, ZHAO Hai-chao⁴,
CHANG Pei-wen¹

- (1.Department of Teaching, 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3.Department of Neurology, 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Shanxi Bethune Hospital the Thir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we reform th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through the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so a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has poor interaction among individual,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environment. A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was set up in the five-year clinical specialty course of a medical university. The SEGUE scale was used for teacher evaluation, medical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and mutual evaluation. The Mini CEX evaluation and satisfaction survey were used to evaluate students'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training effects,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ourse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has advantages in the cours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which can better reflect the situa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rous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bility, and improve student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ctivity-based class teaching mod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cours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ability;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五育并举”视野下的高校音乐教学改革

■高燕¹,高琳²

摘要:“五育并举”为我国高校音乐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推动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走向深入。“五育并举”视野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水平是推进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关键,是营造良好教学生态环境的有效选择,是新时代科学育人理念的呼唤。有效推进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要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丰富音乐教学内容,开展“自省”与“感通”相结合的教学,并且要开展科学的教学评价。

关键词:高校;五育并举;音乐教学;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目标;教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36-0061-04

高校音乐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音乐审美素养的创新型人才,其不仅应具备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等专业技术能力,还应在道德素养方面获得提升。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要与“五育并举”牢牢地连接在一起。“五育并举”的提出,是新时代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方向。只有真正做到“五育并举”,才能为培养音乐高素质人才打下坚实的根基。在高校音乐教学中,必须将“五育并举”有机融入相关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中,开辟出一条的人才培养之路。

一、“五育并举”的新时代内涵

1912年,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首次提出了作为教育方针的五育并举的主张。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五育’并举是指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由

此可见,“五育并举”是指在现代化的教育中通过重视并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它既是对人的素质的综合要求,也是教育要实现的目标。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并举”。德育是方向,在高校音乐教学中,主要通过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美德来实现。智育是基础,要通过音乐教育为大学生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主要表现为创新意识的产生、丰富想象力的创造以及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体育是保障,要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与忍耐力,进而塑造健康的体魄。美育和劳动教育具有启智、育德、健体的功能。通过音乐教育可以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风貌,在音乐教学中,更要注重以德育铸魂,智育启真,体育强身,美育浸润,劳育力行。要以美育浸润,帮助学生提升感受美和创造美的能力,美育是情感教育,更是生命的教育,要通过让学生分享乐律之美舞蹈之美,器乐之美,引导学生认识美、感知美、欣赏美,达到以美育德、以美启智、以美健体。以劳育力行体现为学生辛勤劳动,诚实

作者简介:1.高燕(1981-),女,山西夏县人,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主要从事艺术学研究;2.高琳(1988-),女,山西夏县人,韩国南首尔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艺术经营研究。

劳动,创新劳动,分享劳动成果,鼓励学生在实际行动中创造劳动价值,修炼品行,增强意志。

“五育并举”强调德智体美劳缺一不可,表现出了教育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五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存关系。五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之间互相融合,“德智体美劳构成了新时代‘五育并举’教育体系的重要维度,是我国高校立足新发展阶段对育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1]实行五育并举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五育并举”不仅促进了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了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也为个体的终身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校音乐学专业主要是侧重于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方向的研究和学习,由于其集教育学习与舞台表演于一身,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发挥互为补充的作用,从而为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起到促进作用。高校音乐教学不仅可以根据不同的外在环境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还可以依据具体的课堂授课情形进行教学改变。“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我国新发展阶段对育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教育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基本遵循。”^[2]德育可以使教师与学生两大主体兼具优良的传统美德,智育可以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中的智力因素,体育侧重的是健全的体质与创造意志力的形成,美育强调的是情感的完善,劳动教育则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应将五育并举的方针落到实处。

二、“五育并举”视野下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关健

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任务,对于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而言,必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高校音乐课堂教学目标的设置上来说,让每一位学生走向成才之路可以体现“五育并举”的长远目标;对于高校音乐课堂中的大学生来说,他们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与未来,他们要成为道德

好、智能高、身体强的人才;对于高等学校的教师来说,是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对“五育并举”的追求。

(二)营造良好教学生态环境的有效选择

当前,一些高校音乐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依然固守着“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理念,“满堂灌”现象依旧突出。因此,在高校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应该秉持博大和包容的胸怀去容纳科学的方法与先进的思想,而高校音乐课堂教学改革应基于高校音乐课堂教学理论来进行。对于高校音乐专业的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而言,其学有大成的最高境界便是“物我合一”之境。正如,“生态艺术学的核心是生态艺术观,其理论途径可以概括为从‘美的艺术’到‘生态的艺术’”^[3]。高校音乐课堂教学中的授课环节融汇的是授课教师与教材编写者的智慧和结晶,教师应坚持与音乐、舞蹈表演等人文艺术的境界相统一。

(三)新时代科学育人理念的呼唤

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高校音乐课堂教学应树立科学育人的理念,不仅教会学生以严谨的态度去关注学术问题,更要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大学生在音乐教学中的素质提升等问题,任课教师以及辅导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和教师应更新教学理念,同时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贯彻“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只有坚定不移贯彻好才能提升大学生的素质。

三、“五育并举”推进高校音乐教学改革路径分析

(一)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使命

高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获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高校音乐专业主要是对学科创建、全球视野、社会功能、知识储备、研究方法、课程构建、实践合作、信仰理念、文化特征以及政策文件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和阐释以实现其育人目的,高校音乐课堂教学重心在于育人,而为谁育人、怎样育

人等问题始终是摆在高校音乐教师面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突出德育首要地位,做到五育并举,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高校音乐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在音乐教学中,可以通过讴歌伟大革命先贤以及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歌曲进行德育,通过引领时代进步的歌曲助力其智育。

(二)丰富高校音乐教学内容

随着新型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当代大学生很容易从抖音短视频等传播媒介中获取网络音乐作品,为了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高校音乐课堂教学改革必须坚持“五育并举”,落实全面发展。教师应重点选择表现古今中外人士高尚品德的乐曲,如与“梅兰竹菊”相关联的风霜高洁之歌;着重体现灵动的节奏跳跃,如集历史事件与人生哲理为一体的“人生五味”之歌;可与具体的体育赛事歌曲相关联,如与世界杯相关联的“运动之歌”足以震撼人心。可通过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使学生在能够学习到眼到、口到、手到、耳到和心到,同时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眼、口、手、耳、心之间的协调发展。

从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与信息技术相融合是课堂授课效率以及学生课堂参与度有效提升的关键。计算机、多媒体、短视频等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不仅可以拓宽师生视野,还可以使学生及时掌握音乐表演中的技术要领。高校音乐教师应在及时了解学生对专业以及自身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掌握互联网、多媒体技术在音乐课堂中有效运用的策略,让学生通过观看多媒体(如“红歌”)视频快速掌握所学知识。

(三)进行“自审”与“感通”并重的教学

高校音乐课堂教学在人才培养方面要着重强调内在品德的主动提升(自审)以及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的顿悟(感通);前者强调的是审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后者讲求的是通过丰富的人生经历来验证真伪。有研究

者从主体与客体两大方面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自审’与‘感通’这两个概念,由于其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与艺术本体的贴合性、与中国当前社会深层需要的契合性,可以作为当前建构艺术学话语的两个基点。”^[4]此处的“自审”主要表现的是审美主体在学习人文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善于挖掘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进而在音乐传达中呈现出特有的审美内涵与审美意蕴;“感通”侧重的是心理感应,其是对“自审”环节的延续与升华。“自审”与“感通”并重的教学方法创新,需要高校音乐教师在音乐课堂的授课环节,主动通过音乐鉴赏带动学生实现由“自审”上升到“感通”的审美体验。如教师可以通过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主题曲《微山湖》来启迪学生心灵:首先,让学生感受这首曲子在节奏舒缓处蕴含着深情,在节奏紧急处激荡着革命意志;其次,通过“铁道游击队”等革命志士的传奇经历,让他们真正实现从感受当下美好生活的“自审”上升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感通”。总之,高校音乐教学改革的目标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进行“自审”与“感通”相结合的教学,对高校音乐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是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全面衡量,需要对“教”与“学”两大层面进行较为科学的评判。当前,许多高校教师选择线上与线下“双线融合”的教学路径,因而,传统的高校教学评价观念和方法在新形势与新情况面前需要及时更新与完善,并要建立较为科学的教学评价体系。当然,科学教学评价体系的形成应始终以促进教师和学生全方位发展与进步为前提。传统教学评价已经不适用于当前高校教师所运用的线上与线下“双线融合”的教学,这就需要“基于以人为本、科学系统、互动激励的评价原则,在分析在线教学中,评价指标体系‘多元交互’的核心内涵的基础上,构建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相结合的在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基本框架,并提出多方协同、双核驱动和技术赋能的实践路径”^[5]。

总之,“五育并举”赋予了音乐教育以新的使命和内涵,在音乐教学中,要通过丰富音乐教学的内容,改革音乐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方式,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完善其德育,助力其智育、体育,提升其美育以及推动其劳动教育,进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谢云,余卫东.“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优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2):34-36.
- [2]王茂胜,张凡.“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评价要求[J].思想理论教育,2021,(11):54-59.
- [3]程相占.生态艺术学建构的理论路径:从“美的艺术”到“生态的艺术”[J].艺术评论,2020,(10):54-65.
- [4]汪余礼.自审与感通:当前建构艺术学话语的两个基点[J].民族艺术研究,2022,(3):45-54.
- [5]李欣,张威.“多元交互”在线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内涵、框架及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2,(10):101-107.

作者单位:高燕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 太原
邮编 030006;高琳 韩国南首尔大学大学院 韩国
天安 邮编 3102091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

GAO Yan¹, GAO Lin²

(1.College of Music, Shanxi University;
2.Graduate School of Namseou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Abstract: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d promotes the further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The promotion of the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 effective choice to create a good teach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 call for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music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we should set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educating people for the Party and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When selec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it with the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s”. A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ories, we should focus on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studies, combine “self-examination” with “empathy”, and carry out the scientific teaching evaluation.

Key words: universities;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 music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bjective; teaching evaluation